

#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洪继东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潘 漫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思东 陈 思 姚华庭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 目 录

2026年第1期 总第159期  
双月刊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王天海 徐晓婷 杨 玲  
殷一榕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索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 王海洲 4
- 时代之变与理论创新:习近平对党的统战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强 舸 徐正全 15
- 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的在场样态、现实困境及创新路径 / 颜苗苗 26
- 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层维度和践行机制 / 许川川 李艳艳 陈 涛 34

## 政党制度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机理、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 韩 慧 40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6 年 2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 中国式现代化

- 唯物史观视角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  
宋德孝 李昕怡 49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三维阐释 / 吴 頔 李惠琳 57

## 中华文化

-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 / 徐克谦 64
- “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意涵、理论特征及其思想意义 / 赵 立 73

##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6 - 01

# 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现实挑战与 路径探索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王海洲

**摘要:**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制全面落实,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基于覆盖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2266 份有效问卷和实地调研数据,系统分析当前统战工作责任制在明责、履责、督责、考责各环节的实施成效与存在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责任体系基本建立、协同格局初步形成,但仍面临责任边界模糊、基层力量薄弱、过程监督缺位、考核导向虚化等深层次挑战。据此,从构建分层分类责任体系、健全运行联动机制、完善嵌入式监督网络、优化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形成四责协同机制,为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统战工作责任制;大统战工作格局;四责协同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工作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sup>[1]</sup>2025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对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作出明确部署。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不仅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更

是应对新时代统战工作挑战的现实需要。那么,如何创新理念、方法、机制、载体,将统战工作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便成为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江苏省作为经济大省、科教大省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高度重视统战工作责任制的全面落实,近年来积极探索建立“两清单+五机制”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路径,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全面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一体推动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收稿日期:2025-11-23

作者简介: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2025 年度重点项目“发挥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作用,推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全国提供了有益经验。本研究依托覆盖全省范围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对象范围涵盖各层级、各地区党委(党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企事业单位,共收集2266份有效问卷,数据翔实、代表性强。基于江苏省实地调研情况,并结合全国各地实践经验,深入分析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基本现状、主要挑战及完善对策,以期为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 一、新时代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关键举措,从制度层面回答了统战工作“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抓不好怎么办”等根本性问题<sup>[2]</sup>。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落实,不断健全完善明责有据、履职有为、督责有力、考责有效的运行机制,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起更加磅礴的合力。

#### (一) 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支撑

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关键举措和坚实支撑。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将统战工作从单一部门职责提升为全党共同的政治任务,通过清晰界定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的第一责任人责任、统战部门的牵头协调责任以及相关方面的具体责任,形成了一张严密的责任网络,确保了统战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sup>[3]</sup>。过去,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统战工作可能被视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软任务”,而责任制的全面落地,正是要将这种“软任务”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的“硬指标”,通过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使统战工作的目标更明确、任务更具体、要求更清晰。

这不仅能够有效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统战意识,扭转对统战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清、方法不多的局面,更能从根本上推动形成全党上下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整合,确保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传导至基层、落实在一线,促进统战事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行稳致远。

#### (二) 提升统战工作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

将责任制贯穿于统战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统战领域的必然延伸和内在要求。统战工作涉及面广、政治性强、艺术性高,面对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必须不断提升其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统战工作责任制正是实现这一提升的重要引擎,它通过建立系统完备、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责任体系,为提升统战工作治理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sup>[4]</sup>。具体而言,明晰的责任清单让各级各类主体清楚知晓自身在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做好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网络统战工作等方面的职责任务,避免了职责交叉或出现空白;健全的考核评价机制则将工作成效与干部评价、选拔任用等挂钩,树立起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激发内生动力;严格的监督问责机制则对不履职、不尽责、不到位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确保责任压力传导无衰减。这套组合拳能够有效破解长期制约统战工作落实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各项工作从“做了”向“做好了”“做优了”转变,促使统战工作主体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将统一战线的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更精准、更高效地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治理效能。

#### (三) 确保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充分发挥的制度保障

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

重要法宝，其地位和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更加需要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其深远意义在于，为在新征程上充分彰显这一法宝作用提供稳定、可靠、有力的制度保障。责任制如同“指挥棒”，明确指引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将统战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置于本地区本单位中心工作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确保统战工作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偏离。通过责任制的严格落实，能够有效团结和凝聚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界人士，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从而将蕴藏在统一战线中的磅礴伟力充分激发出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起最广泛的支持力量和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 二、新时代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基本现状

当前，江苏省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逐步构建起明责、履责、督责、考责一体推进的责任闭环机制。在此过程中，各地坚持以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为重要抓手，切

实强化其对统战工作的研究部署、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并持续加强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设，不断提升统筹协调与执行落实能力。同时，各地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作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第一方阵”，进一步压实其政治责任与职能担当，推动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全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一批具有辨识度的制度成果，既体现出规范严谨的治理要求，又展现了贴近基层的实践创新，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

### （一）明责：责任体系逐步完善，清单化管理有序推进

明确统战工作责任是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首要环节，对于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具有基础性作用<sup>[5]</sup>。当前，责任体系日趋完善，清单化管理全面铺开，推动责任边界转向清晰化、具体化。全省各级党委（党组）高度重视党委（党组）统战工作责任清单和领导班子成员职责清单的引领作用，将制定与推行“两个清单”作为压实责任的基础性工作扎实推进。调查数据显示，相关工作正在快速有序推进，有 73.0% 的单位已全面完成两项清单的制定工作（见图 1）。统战工作责任清单的有效落地，为构建清晰的责任认知框架奠定了制度基础，有力推动了各级党组织将统战工作从“概念认知”向“实践操作”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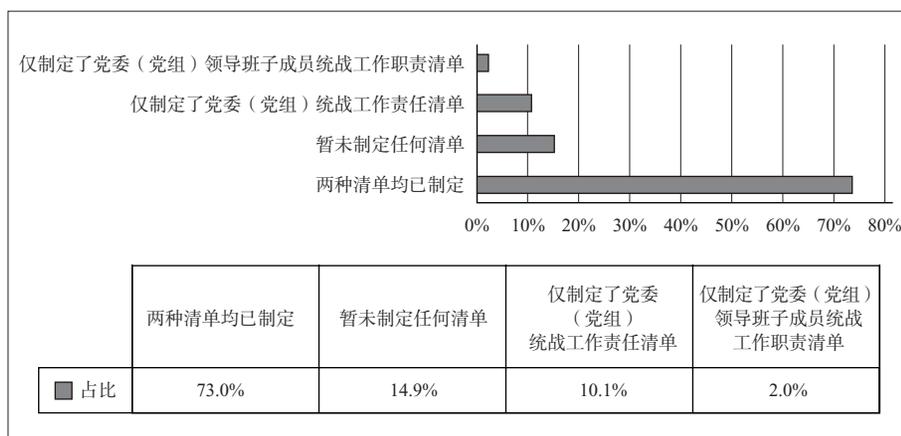


图 1 相关职责和责任清单完善情况

在具体实践中，各地通过结构优化与方案实施双轮驱动，系统推进责任内容明晰化。一方面，在组织架构上，多地通过设立专职机构或优化部门设置（如统战与群工处），实现对上衔接有序、部门协调有力、对下指导有效、基层执行有据；在责任清单方面，创新推行“清单化、项目化、品牌化、责任化、组织化”工作方法，建立从责任明确到督办落实的闭环机制，并以表格形式印发清单，明确每项任务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另一方面，各地积极推动宏观政策在基层的精准转化，通过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将原则性要求系统分解为可操作、可考核的工作任务，为责任的有效传导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调查数据显示，82.0%的单位已制定完成本层级细分领域的实施方案（见表1），这为责任体系建设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落实”奠定了扎实基础。

**表1 本级细分领域统战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制定情况**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否	407	18.0%	18.0%
是	1859	82.0%	100.0%
合计	2266	100.0%	

（二）履责：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协同格局逐步形成

随着责任体系逐步明晰，各地将工作重心转向具体实施，推动统战工作部署日益常态化、制度化，并积极促进统战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合。调查数据显示，78.8%的党委（党组）常委会能够做到每年至少2次专题研究统战工作并作出部署，其中32.2%的党委（党组）常委会研究频次达到每年4次及以上，均超过“每年至少研究1次”的基本要求（见表2）。在这一过程中，多地通过健全议事协调、信息互通和任务交办等机制，逐步构建起上下协同、运转顺畅的履职体系。上述进展表明，统战工作已稳步纳入各级党委（党组）

常规议程，成为一项持续跟进、定期调度的重点工作，为责任的层层传导与有效落实提供了机制保障。

**表2 各级党委（党组）对统战工作责任制的重视程度**

项目	选项	频数	占比
党委（党组） 常委会定期研究 部署情况	2次	891	39.3%
	4次及以上	729	32.2%
	1次	427	18.8%
	3次	165	7.3%
	暂未研究和部署	54	2.4%

在推动统战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实践中，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着力构建具有统战性、民间性、专业性等不同特征的社会化组织体系。通过促进工商联、新联会、职教社等各类组织发挥其独特属性优势，推动形成各尽其责、协同发力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如无锡宜兴市委统战部指导新联会建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中介组织、自由职业、新媒体群体的代表人士和技术骨干的力量，围绕中心大局，服务社会。同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荷兰代尔夫特等地设立“海外青年驿站”，在杭州、厦门、香港等地设立7个“乡情驿站”，立足市博物馆、市图书馆、闵惠芬故居创新建设3个“乡情原点”文化交流基地，充分发挥陶博馆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大觉寺对台交流基地作用，有效拓展统战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南通市海门区委统战部则依托《全区统一战线“同心向海·产才回归”行动实施方案》，系统推进四项重点行动，拓展港澳及东南亚侨商联络站，促进资本与产业对接；充分发挥海外联谊会、欧美同学会、商会等组织的资源优势，推动海外人才、产能、资本回归家乡。这些实践从组织建设、平台搭建、路径创新等维度，积极探索统战工作与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有效模式，为构建社会化、专业化、开放化的统战工作新格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 督责：监督体系逐步健全，过程监控同步增强

督责是确保统战工作责任制从“纸面”落到“地面”的关键环节，对压实主体责任、贯通责任链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江苏省相关规定，各级党委已将下级党组织贯彻落实统战工作决策部署情况纳入巡视巡察和督查体系。在省级层面，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制定工作细则，强化对部署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在地方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作出了探索，如南通市海门区将统战工作纳入纪委监委（巡察办）巡察、监督执纪问责范围；泰州市将责任制落实情况列为政治巡察重点领域、列入市级督查计划并开展专项督查。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党委领导、统战部门牵头、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督责机制，为统战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制度框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督责工作的执行层面也呈现出系统化、常态化的发展态势。调查数据显示，96.8%的单位已开展对下级党组织的统战工作指导和督查，反映出督责机制已实现广泛覆盖。与此同时，63.8%的单位建立了常态化报告机制，每年向上级党委专题报告统战工作至少2次（见表3），形成了“自上而下”督查与“自下而上”报告的双向互动模式。这种检查与报告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有效强化了过程监控和责任传导，推动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性循环，促进统战工作从“上层推动”向“全面落地”发展。

表 3 党委（党组）向上级报告工作情况

项目	选项	频数	占比
党委（党组） 向上级报告工作情况	2次	804	35.5%
	4次及以上	740	32.7%
	1次	548	24.2%
	3次	94	4.1%
	暂未报告	80	3.5%

(四) 考责：考核体系持续完善，激励约束导向更加鲜明

随着统战工作责任体系不断健全，各地积极推进考核机制建设，激励约束导向更加鲜明，实现以考促干、以评促效，推动了考核评价从“软指标”向“硬约束”转变，考核的指挥棒作用逐步显现。在机制创新方面，多地探索建立“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考核模式，将统战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从考核权重设置来看，统战工作纳入高质量综合绩效考评的比例呈现梯度分布特征。数据显示，考核权重在6%—10%的单位最为集中，约占43.8%（见表4）。分布表明，绝大多数单位已将统战工作纳入绩效考评体系，反映出考核机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压实统战工作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问责机制有效运行，形成有力的约束导向。

表 4 统战工作纳入高质量综合绩效考评占比情况

考核权重占比	频数	占比
0%—5%	894	39.5%
6%—10%	993	43.8%
11%—15%	41	1.8%
16%—20%	96	4.2%
21%—30%	68	3.0%
31%—60%	47	2.1%
61%—100%	74	3.3%
不清楚	53	2.3%
总计	2266	100.0%

数据显示，7.7%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或领导干部因履行统战职责不力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表明责任追究机制在实际执行中并非空设，已形成一定威慑（见表5）。考核与问责的双轨并行，逐步构建起“激励有为、约束不为”的履职氛围，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制从制度设计走向实践深化。

表5 领导干部统战履责不力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情况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否	2091	92.3%	92.3%
是	175	7.7%	100.0%
合计	2266	100.0%	

### 三、新时代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现实挑战

统战工作责任的落实成效，直接关系到统战工作整体效能和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与完善<sup>[6]</sup>。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当前统战工作责任的全面落实仍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制约着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整体效能提升。从“明责—履责—督责—考责”全链条来看，各环节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和短板。在“明责”环节，职责边界模糊、政策传导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导致部分责任主体与任务范围未能清晰锚定；在“履责”环节，受限于专职力量薄弱、资源保障不足等因素，责任落实面临“有心无力”的执行困境，基层统战责任压实与减负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在“督责”环节，过程监督偏软、外部参与不足，使得责任落实缺乏全程跟踪和有效约束；在“考责”环节，则突出表现为考核权重偏低、指标设置脱离实际、结果运用激励不足等问题，

难以形成科学闭环和有力导向。为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地见效、提升统战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系统治理的视角出发，着力破解全链条中各环节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一）明责：责任认知尚需深化，清单实操指引有待加强

调研发现，当前明责环节仍面临责任界定笼统、基层执行焦虑突出的问题。虽然各地已普遍制定责任清单，但清单内容存在“原则要求多、具体指引少”的倾向，条目表述较为宏观。例如，各单位的责任清单中普遍把“将统战工作与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进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作为第一条责任，但缺少具体的细化标准、工作流程和资源保障说明，导致基层在执行中难以准确把握“如何负责”与“负责到什么程度”。问卷调查显示，针对“在落实统战工作具体任务时，会担心因政策把握不准或方法不当而引发问题”，有52.6%的受访者选择“8分及以上”（其中32.0%选择10分，占比最多），表明超过一半的基层干部高度认同这种担忧；另有32.8%选择“5—7分”，显示出普遍存在的不安与谨慎心态；而明确表示低担忧（1—4分）的仅占14.7%（见图2）。这一结果反映出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在落实统战任务时，对政策理解和执行方法存在明显顾虑，背后折射出其对统战职责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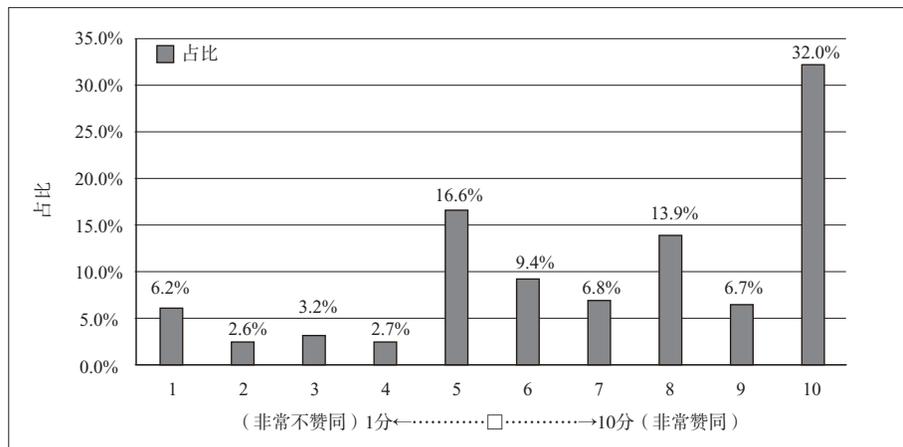


图2 基层干部落实统战工作时的履职顾虑情况

知不全面、边界把握不清晰以及执行信心不足的现实困境。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传导和实操支撑两个层面。一方面，政策文件可获得性不足，影响理解深度。部分统战政策文件受传达范围限制，基层难以获取完整文本，政策理解多依赖会议或摘要传达，难以形成系统认知<sup>[7]</sup>。另一方面，清单配套指导的缺失制约执行效果。数据显示，仅 35.2% 的单位开展过清单专题培训，且培训内容以政策解读为主，缺乏情景模拟、案例教学等实操环节。同时，清单制定过程中缺乏针对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职能的差异化指导，导致内容“上下左右一般粗”，既无法体现部门特点，也难以应对与上级要求存在差异的具体事项。这导致政策理解难以深化，认知障碍持续存在，因而清单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未能成为破解“如何负责”问题的有效工具。

(二) 履责：基层负荷较重，保障能力不足

当前履责环节面临两方面突出问题，制约着责任制从“纸面”到“地面”的有效转化。一是基层力量相对不足，“小马拉大车”现象较为普遍。当前，基层统战工作力量配置相对有限。数据显示，68.6% 的部门负责统战工作的行政编制为 2 个及以下，41.1% 的负责人为兼职。由于专职力量不足、兼职人员精力分散，加之部分单位对统战工作的全局性和战略性认识有待深化，未能将其摆在与其他中心工作同等重要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基层学校，统战工作多由德育主任或行政人员兼任，他们在开展党外知识分子联络、民族学生权益保障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时，因日常事务繁重且缺乏系统培训，往往难以提供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日常事务，难以进行深度谋划与系统推进，导致统战工作与业务工作在实践层面呈现“两张皮”。二是资源保障不足，“各负其责”格局有待完善。有些地区统战工作缺乏稳定专用经费保障，预算分配仍偏重宗教、民族等传统领域，对新的社会阶层等群体覆盖不足。

部分地区经费总额呈递减趋势，导致诸如乡贤座谈会、民族文化节等各类统战活动难以持续开展，影响了“团结引领”“组织覆盖”等责任制核心目标的实现。由于缺乏常态化联系指导和必要资源支持，难以充分释放商会、新联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积极作用，社会化的统一战线组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造成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战略认知存在偏差，影响工作权重。调研显示，27.7% 的党委（党组）将统战工作视为次要工作（见表 6），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言及统战即“联谊会”“安置所”“退休中转站”的认识误区，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影响其在整体布局中的资源投入和责任落实优先级。另一方面，制度支撑体系不完善，制约履职基础。编制配置与工作总量不匹配、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制度性问题，加上部门间数据壁垒导致的信息支撑不足，共同造成了基层在减负要求与责任制落实的双重压力下难以实现专业化服务和精细化管理。基层工作人员既要对接上级多个处室，又要承担商会、新联会等组织的建设与联络任务，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压力与点多面广的工作任务相互叠加下，容易出现任务难以落地落实的工作困境。

表 6 针对统战工作在整体工作布局中具有优先地位的态度

标度 1 分←……□……→ 10 分 (非常不赞同) (非常赞同)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33	1.5%	1.5%
2	33	1.5%	3.0%
3	87	3.8%	6.8%
4	74	3.2%	10.0%
5	401	17.7%	27.7%
6	218	9.6%	37.4%
7	165	7.3%	44.7%
8	292	12.9%	57.6%
9	131	5.8%	63.4%
10	832	36.7%	100.0%
合计	2266	100.0%	

(三) 督责：过程监管缺位，巡察统筹不足

当前督责环节主要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影响责任压力的有效传导。一是过程督导机制缺失，执行环节存在监管盲区。监督体系过度依赖年度考核等事后评价方式，对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执行标准、推进节奏和规范操作等环节缺乏常态化的督导与纠偏。具体表现为：上级部门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执行偏差，往往等问题显性化后才介入，纠错成本高昂；基层单位因缺乏过程指导，往往依靠自身理解推进工作，导致执行效果参差不齐。这种“重事后问责、轻过程指导”的监督模式，使得责任意识在传导过程中层层衰减。二是巡视巡察对统战工作责任制的监督尚需深化和聚焦。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统一战线工作的执行情况应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纳入政治巡视巡察和监督执纪问责的范围。然而，在当前实践中，巡视巡察工作对统战工作责任制的作用仍不充分。由于专项监督安排与精准评估标准尚未健全，加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推动职能难以常态化，共同制约了对党委（党组）履行主体责任的监督深度及精准性。

(四) 考责：考核权重偏低，指标设计虚化

考责环节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突出问题，制约着考核“指挥棒”作用的有效发挥。一是考核权重设置失衡，导向作用不明显。调研数据显示，统战工作在整体绩效考评体系中的权重普遍不足10%，部分基层单位反映其考核权重从原有的10%被压缩至6%，远低于其他重点工作20%左右的占比（见表7）。这种权重设置的失衡，直接导致统战工作在综合绩效体系中影响力较弱，难以引起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37.7%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有必要”提升统战工作在绩效考核中的占比（见表8），体现出基层对强化考核激励性和导向作用的普遍期待。此外，当前考核体系在强调正向激励的同时，缺乏必要的负向问责机制，尤其在风险防控、底线坚守等关键方面的

考核力度有待加强。

表7 统战工作纳入高质量综合绩效考评占比情况

考核占比	频数	百分比
0%—5%	894	39.5%
6%—10%	993	43.8%
11%—15%	41	1.8%
16%—20%	96	4.2%
21%—30%	68	3.0%
31%—60%	47	2.1%
61%—100%	74	3.3%
不清楚	53	2.3%
总计	2266	100.0%

表8 针对提高统战工作绩效考评占比的态度

标度 1分←……□……→10分 (完全没必要) (非常有必要)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90	4.0%	4.0%
2	47	2.1%	6.1%
3	77	3.4%	9.5%
4	53	2.3%	11.8%
5	431	19.0%	30.8%
6	174	7.7%	38.5%
7	141	6.2%	44.7%
8	252	11.1%	55.8%
9	147	6.5%	62.3%
10	854	37.7%	100.0%
合计	2266	100.0%	

二是指标体系设计不科学，偏离基层工作实际。问卷调查显示，50.9%的单位认为上级考核要求与本地实际情况存在差距（见图3）。这反映出当前考核存在多重问题。一方面，指标设计“一刀切”，未能充分考虑地区、部门的差异性与工作实际，针对性不强。另一方面，考核内容存在“重形式过程、轻实质成效”的倾向，过度关注是否“开展了”某些活动（如会议次数、文件数量），而忽视了团结引领的实际效果、矛盾化解的真实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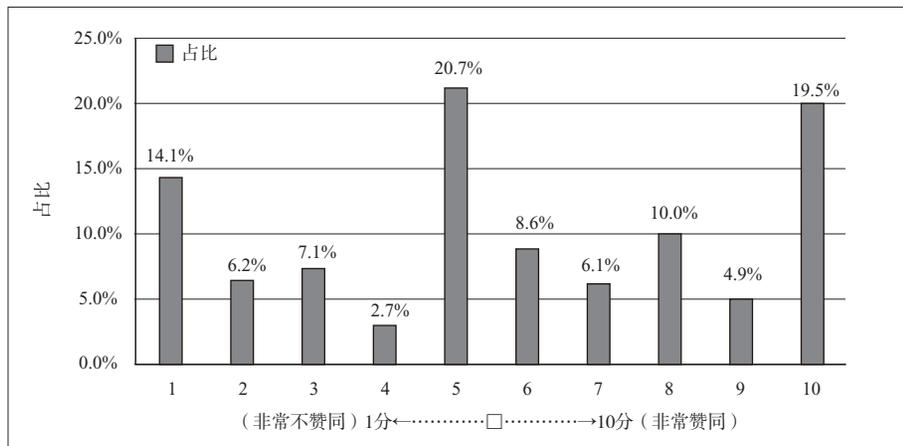


图3 对上级考核要求与本级实际存在差距的态度

等根本问题。特别在责任清单的考核上,存在“重制定、轻落实”的偏差,更为关注清单是否制定、文本是否完备等形式要件,而对清单是否契合地方实际、能否有效指导并推动工作落实的关注相对不足,导致考核导向与工作实际有所脱节。

#### 四、新时代更好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的政策建议

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是新时代统战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为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统战工作责任体系,确保责任制真正做到层层传导压力、环环形成闭环、项项落地生根,需要在落实好《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细化措施、强化执行。应围绕“明责、履责、督责、考责”四个关键环节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链条,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创新和实践探索,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制从“纸面要求”转化为“落地见效”,切实发挥统一战线在新时代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法宝作用。

(一) 明责清单化: 构建边界清晰、分级分类的责任体系

要以清单化、制度化建设为牵引,继续深化责任体系建设,使统战工作做到权责清晰、运行规范、有章可循<sup>[8]</sup>。一是完善分层分类责任清单制度。在省级统战部门统一指导下,对照《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责任制相关规定,结合各层级党委和各部门单位在统战工作中的职责定位以及统战对象分布特点,构建科学、系统、差异化的责任清单,确保省、市、县、乡、村各级党委以及部门党组(党委)“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有明确制度依据,使清单能够反映各自职能特点并兼顾可操作性,从而实现责任的层层传导、逐级压实。二是细化基层单位和领导干部责任目录。将统战责任向基层延伸、向岗位细化,通过完善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专责、相关科室负实责的链条,将责任明细化到组织、具体化到岗位、精确化到个人,使每名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具体工作人员明确掌握自身统战职责,做到职责边界明晰、工作任务明了、责任要求明确。三是优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体系,通过重新梳理、重新界定各成员单位在重点领域的工作责任,构建涵盖职责列表、目标任务、协同事项和完成时限的“职责矩阵”,健全议题提出、任务分办、办理反馈、跟踪督办等工作制度,强化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确保议定事项形成闭环管理、推进机制清晰通畅、责任链条完整顺畅,真正推动统战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二) 履责协同化: 健全党委领导、多方联动的运行机制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通

过协同联动机制建设形成整体推进的大统战格局,让统战工作资源整合更充分、责任落实更有力、运行机制更顺畅<sup>[9]</sup>。一是强化党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枢纽功能。进一步提升各级党委统战部在统筹协调、综合研究、政策制定、资源整合、督促检查等方面的组织能力,健全议题设置、线索收集、形势分析、信息通报等制度化建设,建立更加顺畅的沟通链条和更加规范的运行流程,使领导小组在决策指导、统筹协调、推动落实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二是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依托领导小组统筹,推动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责主动参与统战工作,将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工商经济、教育科技、人社司法、文旅卫健等部门纳入系统性协同体系,通过建立联合调研、联合督查、资源共享、定期会商等机制,使部门之间形成优势互补、信息互通、政策联动的工作模式,增强统战工作整体效能。三是激活社会组织统战功能。加强对工商联、知联会、新联会、职教社、行业商会、同乡会、校友会等统战群团组织的政治引领和业务指导,通过政策扶持、项目支持、平台搭建和情感联谊等方式,使其在联系特定群体、反映群体诉求、凝聚社会资源、参与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大统战运行体系,让统战工作力量更加多元、渠道更加丰富、覆盖更加全面。

(三)督责常态化:完善嵌入巡察、精准高效的监督网络

要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贯通、常态运行的监督体系,把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全面监督,推动责任压力持续传导、制度效能持续释放。一是推动统战工作纳入巡视巡察监督体系。将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要组成部分,将党委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落实情况和成员单位履职情况纳入巡视巡察监督内容,构建涵盖指标体系、督查流程、问题台账和整改机制的制度化监督链条,实现监督对

象全覆盖、监督内容全要素、监督过程全闭环。二是提高监督的精准化和专业化水平。根据不同地区统战对象结构不同、行业领域差异明显、层级职责不一等特点,精准设置监督重点。民族地区聚焦民族宗教工作,经济发达地区突出非公经济统战工作,高校紧盯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新兴行业聚集区强化社会组织引导和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真正做到监督方向明确、靶向发力精准,避免流于形式或“一刀切”。三是健全监督结果反馈和整改机制。通过构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三单机制”,实行限期整改、动态跟踪、复核评估等措施,确保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整改情况及时反馈、整改成效及时固化,实现监督和整改有机衔接、形成闭环,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地见效。

(四)考责实效化:树立奖优罚劣、容错激励的鲜明导向

要把考核作为推动统战工作责任落实的重要抓手,通过科学评价体系、严格结果运用和完善激励机制,形成敢抓敢管、激励担当、鼓励创新的工作氛围。一是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在各类党建考核、绩效考核、年度考核中适度设置统战工作权重,建立基础指标、重点指标、创新指标“三位一体”的考核体系,全面评价各地规定动作的完成质量、重点任务的推进力度以及创造性抓统战工作的实效,推动考核更加注重实绩、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具有引导作用<sup>[10]</sup>。二是强化考核结果运用的刚性约束。将考核结果与干部使用、评先评优、任免调整、绩效激励等挂钩,对履责到位、成效突出的单位和干部给予通报表扬、资源倾斜等激励措施,对工作不落实、效果不明显的单位约谈问责,真正做到奖惩分明、以干促干,让统战工作成为干部评价的重要参考项。三是完善容错纠错和激励担当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对在推动统战工作改革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非原则性、非主观性失误给予容错,对敢创新、敢担当、敢作为的干部给予鼓励和保护,

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支持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广大干部在统战工作中大胆实践、勇于突破、争创一流。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40.
- [2] 曹天富，宋善定. 横向集群纵向建链终端固本 [N]. 人民政协报，2022-05-13(3).
- [3] 张晓君. 学懂弄通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23(1)：13.
- [4] 张晋岚，徐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行动逻辑与路径创新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4)：134.
- [5] 林怀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阐释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9)：24-25.
- [6] 艾明江. 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和完善 [J]. 理论视野，2025(1)：43.
- [7] 肖静. 新时代高校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路径研究 [J].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37.
- [8] 郑冯涛. 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价值、内涵、困境与实践路径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5)：35.
- [9] 张克.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4(4)：38.
- [10] 刘小蒙.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实践要求与路径探析 [J].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4)：37.

责任编辑：徐晓婷

# 时代之变与理论创新： 习近平对党的统战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强 舸 徐正全

**摘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统战工作规律，敏锐洞察、科学研判时代之变，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战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理论定位上，实现从“重要法宝”到“重大战略问题”的跃升，为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在实践方略上，对“五大关系”进行创新发展，破解社会深刻变化带来的全新课题；在策略方法上，构建系统化、制度化的方略体系，着力提升应对复杂局面的实战能力，确保统战工作不断为新时代伟大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创新

## 一、前言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sup>[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sup>[2]</sup>。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这一重要思想是指导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指南，为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提供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sup>[3]</sup>，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sup>[4]</sup>。因此，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更为多元的社会结构中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战略定力，拓展团结的

收稿日期：2025-12-31

作者简介：强舸，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领导体制、党建与国家治理；徐正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党建、统一战线。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ZK0120250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广度、深化共识的深度、提升服务的效能，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凝聚人心和力量。为此，基于所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实践发展新要求，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各创新论断之间的有机联系，有助于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进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提供理论借鉴。

## 二、跃升：从“重要法宝”到“重大战略问题”

基于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科学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理论定位上实现了从继承“重要法宝”的历史共识到开创性地将其提升为“重大战略问题”的跃升。

### （一）对“统一战线法宝论”的历史坚守

统一战线理论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早已深刻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5]</sup>，从哲学层面揭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阶级必须通过联合才能获得解放这一真理。他们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sup>[6]</sup>，奠定了统一战线作为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基本策略原则。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丰富并发展这一思想，他精辟地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sup>[7]</sup>，这凸显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对统一战线重要作用的理解。

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毛泽东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法宝论”。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sup>[8]</sup>，这指明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

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sup>[9]</sup>江泽民指出：“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sup>[10]</sup>胡锦涛强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sup>[11]</sup>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一贯重视、对统一战线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sup>[12]</sup>这一论断既是对党的统一战线优良传统的坚定继承，又根据新时代的特点赋予“重要法宝”新的时代内涵，强调其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sup>[13]</sup>，“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4]</sup>，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 （二）从“重要法宝”到“重大战略问题”的定位跃升

在继承“重要法宝”定位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统一战线定位实现从策略层面到战略层面、从局部范畴到全局范畴、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升。

从服务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策略工具上升为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顶层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将统一战线明确为“重大战略问题”，将其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层面。他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sup>[15]</sup>新的定位表明，统一战线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性、长远性战略，必须从党中央的高度进行系统性谋划、前瞻性部署。

从统战部门主导的专项工作拓展为需要全党

动手、各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sup>[16]</sup>，“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sup>[17]</sup>。《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将统一战线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sup>[18]</sup>，意味着统一战线已深度融入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领域和全过程。

从注重效用的工作方法深化为彰显制度优越性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将统一战线从克敌制胜、发展经济之“术”的层面升华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道”的高度。它不仅是凝聚力量的手段，更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载体，做好“民主和协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sup>[19]</sup>。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sup>[20]</sup>，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统一战线从外在的“用”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内在的“体”，其价值理性得到有力彰显。

（三）应对新时代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的宏观必然

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sup>[21]</sup>。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部分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频频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问题上发起攻击，动辄采用“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手段，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渗透、颠覆、分裂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sup>[22]</sup>，“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sup>[23]</sup>，这正是要求我们必须运用好统一战线，在国内外斗争中争取更多朋友，瓦解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

营造于我有利的内外部环境。通过培育海外爱国力量，巩固壮大知华友华“朋友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让统一战线成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点。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统一战线是凝聚中华儿女磅礴力量的系统工程。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sup>[24]</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我们绝不能“千里走单骑”，而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sup>[25]</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sup>[26]</sup>这意味着统一战线的团结范围要更广、凝聚共识要更深、汇聚力量要更强，要贯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手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sup>[27]</sup>等都是必须解决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sup>[28]</sup>通过统一战线，可以最广泛地听取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接受民主监督，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不断巩固工农联盟，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防止出现政治对立面，此即“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更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sup>[29]</sup>。通过团结引领，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通过强大的政治

联盟巩固执政根基。

### 三、发展：新时代“五大关系”的深化与拓宽

作为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工作范围的界定始终与我国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五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关系的科学概括，构成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实践范畴。回顾历史，“五大关系”的形成经历过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1950年4月，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把“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sup>[30]</sup>作为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处理的四个方面的关系。1962年4月，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把“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sup>[31]</sup>明确为统战工作要处理好的关系。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sup>[32]</sup>，强调了统战工作要向海外拓展。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sup>[33]</sup>。2006年7月，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sup>[34]</sup>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正式形成今天的统战工作“五大关系”基本格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内外环境新情况对“五大关系”作出与时俱进的创新。

（一）政党关系：从长期共存到效能提升的新型政党制度论

多党合作制度事关我国政局稳定。没有政局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sup>[35]</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为多党合作事业指明了方向。其一，创造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sup>[36]</sup>的论断，推进多党合作制度更好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其二，用“好参谋、好帮手、好

同事”<sup>[37]</sup>这一生动表述明确新时代民主党派的角色定位，体现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其三，旗帜鲜明地要求“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sup>[38]</sup>，将着力点放在“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健全议政建言机制”“有序开展民主监督”“提升制度效能”上，推动这一制度从有到优、从成熟定型到充满效能的深刻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其任务之艰巨使得传统的、相对公式化的政治参与形式不足以满足治理需求，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参与主体的智力潜力和实践能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正是要求其发挥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联系广泛优势，在破解发展难题、凝聚社会共识方面提供更具前瞻性、专业性、操作性的决策参考。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sup>[39]</sup>，传统的、相对单一的利益表达渠道难以覆盖所有社会群体。在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对外交往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强化其参政议政职能有助于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将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有序纳入制度之中。此外，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一个必须答好的重大课题。民主党派作为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在民主监督方面具有独特视角和专业性强的优势。支持民主党派“讲真话、建诤言”，是执政党接受“政治体检”的外部视角，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偏差，防止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实现更高质量的治理。

（二）民族关系：从平等团结到共同体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论

在民族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

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sup>[40]</sup>，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sup>[41]</sup>。这一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与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历史观上的升华，深刻阐释在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华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sup>[42]</sup>的宏大叙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另一方面，体现在工作重心的转变上，强调“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sup>[43]</sup>，将民族工作的重心从以往侧重于经济扶持、政策优惠，深化为构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一更根本的战略任务，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境界。

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一直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与我们长期较量的领域。当前，一些边疆民族地区深受“三股势力”的叠加影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西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对我进行污名化攻击，并利用民族问题实施分裂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满足于表面的政策供给，而忽视深层次身份认同的构建，可能会给错误思想的渗透留下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从思想和情感深处筑牢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堡垒，从根本上铲除分裂主义滋生的土壤。与此同时，近年来，各民族流动人口空前增长，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各民族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新态势在促进团结的同时，也使得不同民族成员在直接频繁的交往中，容易因文化习俗和利益差异而产生新的摩擦。基于地域和特定民族的传统扶持政策难以完全适应这种“大流动、大融合”的新态势。唯有强化“共同体”意识，

在社会层面构建相互嵌入、共生共荣的社会结构，引导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此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在政策实施和学术研究中，对民族差异的强调程度过高，而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有所忽视，这可能无形中强化了群体界限，阻碍国家认同形成。这需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桥梁来加强沟通和认同，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源泉来培育共同体意识，从而实现思想观念从“我是某个民族的一员”到“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的升华，为中华民族大团结提供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纽带。

（三）宗教关系：从引导适应到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治理理论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sup>[44]</sup>。在宗教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宗教工作规律，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一重大要求。首先，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明确要求和清晰路径，明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sup>[45]</sup>的主要任务，回答如何适应、向何处适应的时代之问。其次，强调“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sup>[46]</sup>，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支持宗教界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最后，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与“运用思想教育、文化引领、政策指导、行政管理、法律治理等手段”<sup>[47]</sup>紧密结合，体现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系统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断是基于对当前宗教工作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的深远战略考量。一是要抵御外部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干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当前，一些西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工具，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境外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风险不断加大，对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现实威胁。

必须从宗教自身建设入手,通过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培育抵御渗透的内在抗体,牢牢把握宗教工作的主导权。二是要应对网络宗教活动的兴起,规范宗教事务治理。互联网的普及使宗教信息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分散隐蔽的网络宗教活动给传统管理模式带来巨大挑战,也容易滋生各种乱象。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将“引导”这一理念延伸至网络空间,依法管理网络宗教活动,推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在网络世界得到落实,确保宗教领域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要解决宗教领域存在的商业化等突出问题,引导宗教健康传承。个别宗教商业乱象,不仅损害了宗教的社会形象,也侵蚀了宗教的健康肌体。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需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引导宗教摆脱功利主义和世俗化的侵蚀,通过加强宗教界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净化心灵、涵养道德的积极作用。

(四) 阶层关系:从广泛团结到政治引领与健康发展的阶层和谐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各方面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重要工作”<sup>[48]</sup>，“要健全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sup>[49]</sup>，“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sup>[50]</sup>，筑牢团结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对留学人员，突出“弘扬留学报国传统”<sup>[51]</sup>，继续发挥“人才库”“智囊团”和“生力军”作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创新性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sup>[52]</sup>主题，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等具体路径<sup>[53]</sup>，推动民营经济人士作典范、作建设者和促进者。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主要包括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

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sup>[54]</sup>。他们大多脱离传统体制，思维活跃，流动性强，使得传统的统战工作模式面临“跟不上、联不上、不实用”的挑战。明确对此类群体的统战工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作”，需要创新工作方法，组织和调动这支庞大的人才库和智囊团，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同时，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然而，部分民营企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困难、融资难、经营粗放、创新不足等挑战。“两个健康”和“亲清政商关系”的提出旨在优化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巩固和增强实体经济根基。此外，随着民营经济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大批价值观多元、具有新世代特征的年轻企业家涌现。他们的政治认同、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未来的方向。单纯的物质激励或松散的联系，已不足以满足凝聚力的需求。必须通过“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继承和发扬听党话、跟党走优良传统，努力成为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模范，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队伍的政治本色不变、优良传统不丢、创业激情不减。

(五) 海内外同胞关系:从爱国一家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大团结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sup>[55]</sup>。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起点，为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一是目标更加宏大。强调要“画出海内外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同心圆”<sup>[56]</sup>，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将爱国主义旗帜举得更高。二是策略更加精准。对港澳强调“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sup>[57]</sup>，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台湾强调“深化两岸各领

域融合发展”<sup>[58]</sup>，促进心灵契合；对海外侨胞注重“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sup>[59]</sup>。三是格局更加开阔。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之中，使之成为汇聚人类正道的磅礴伟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争取人心的历史自觉和战略远见。

“画出最大同心圆”这一方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内外同胞关系领域深刻复杂变化所进行的精准研判与战略应对。其一，港澳正经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在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的同时，港澳工作重点转向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其二，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进行挑衅，对台工作的挑战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在坚决反分裂、反干涉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通过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落实同等待遇政策来争取台湾民心，夯实和平统一的基础。其三，海外侨情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逐渐成为主体，其思维方式、利益关切以及与祖（籍）国的联系模式均不同于老一代侨胞，传统的侨务工作方式面临如何有效联系、团结和引导新生力量的现实课题。面对这三方面深刻变化，简单沿用过去的工作思路已难以为继。“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论断，通过巩固“圆心”来明确底线和方向，确保大团结大联合的正确政治方向；通过延长“半径”来拓展包容与空间，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港澳，通过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使港澳同胞切实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对台，通过持续推进融合发展，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深化其对国家的认同；对海外侨胞，则通过完善为侨服务体系，保护其合法权益，支持其传承中华文化，使其成为连接中外的桥梁纽带。

#### 四、创新：话语、方法与制度的协同集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策略方法”<sup>[60]</sup>。

在党的统战工作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求同存异、民主协商、联谊交友、教育引导、照顾利益等行之有效的有效的工作方法<sup>[61]</sup>。回溯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史，“求同存异”的策略智慧贯穿始终，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丰富的实践形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sup>[62]</sup>，并强调“真理不在于清一色”<sup>[63]</sup>，这是“求同存异”在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阐述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求同存异”原则处理社会内部差异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sup>[64]</sup>。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并继承发展“求同存异”这一统战工作的灵魂，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列入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十二个必须”之一，强调“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sup>[65]</sup>，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sup>[66]</sup>。

（一）话语体系的创新：以生动表述凝聚广泛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sup>[67]</sup>。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阐述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理论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为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

一是“同心圆”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sup>[68]</sup>。赋予“固守圆心”与“扩大包容”的辩证关系以直观的几何意象。这一比喻深刻揭示统一战线的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圆心”象征着不可动摇的政治底线，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半径”

则代表着在坚持政治底线前提下对多样性的尊重与包容，半径越长，团结的范围就越广。这一论述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抽象关系转化为生动认知，深刻阐明坚持党的领导与广泛凝聚共识是内在统一的。

二是“石榴籽”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sup>[69]</sup>。这以极具生活气息的比喻，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团结的理想形态。“石榴籽”的意象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每一粒石榴籽都是独立的，象征着每个民族丰富的人文个性和文化；但它们又紧紧相拥、共生共存于石榴果中，象征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团结一心、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号召，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主题，转化为情感上可感知、行动上可效仿的生动图景。

三是“最大公约数”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sup>[70]</sup>。借用数学概念，为凝聚共识的过程提供精准的方法论指导。“公约数”意指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诉求；“最大公约数”则意味着在承认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前提下，寻求最广泛共识的极致努力。这一论述将协商民主、政治引导的过程形象地阐述为一个不断寻找、扩大共识的过程，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话语体系创新是对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与传播环境的精准回应与战略引领。应当看到，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博弈和价值观较量空前激烈，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sup>[71]</sup>，各种社会思潮不断交流、交锋、交融。同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信息传播方式、社会舆论生态发生颠覆性变化，传统的、单向度的、说教式的宣传引导方式效果式微。在此背景下，“同心圆”“石榴籽”“最大公约数”等一系列生动形象且贴近生活的比喻，成功地将深奥的政治理念和

战略原则转化为通俗易懂、广受欢迎且为大众所认可的鲜活语言，这也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和宣传艺术的体现。它们极大地增强了统一战线概念的亲和力、传播力和感染力，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飞入寻常百姓家”，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统一战线成员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牢牢掌握复杂思想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有效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实践方法的创新：以精准艺术提升工作效能

统战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求很强的工作艺术<sup>[72]</sup>。习近平总书记从操作层面阐述做好统战工作的具体方法，将统一战线的策略艺术具象化为可学可用的实践指引。

一是善于联谊交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sup>[73]</sup>，要“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sup>[74]</sup>。他要求统战干部对党外人士“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sup>[75]</sup>，要交诤友、挚友，真正做到肝胆相照。对知识分子等特定群体，要“善交朋友、广交朋友、深交朋友”<sup>[76]</sup>。这种方法论要求，将统战工作从程式化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做“人”的工作的本质，通过充满人情味、个性化的交往，建立信任，凝聚人心。

二是尊重、包容与引导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求同存异”的辩证法。一方面，强调要发扬民主、宽以待人，“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sup>[77]</sup>；另一方面，对危害党的领导、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等原则性问题，则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他要求在各种协商中“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sup>[78]</sup>。这体现既尊重包容多样性，又坚持原则底线，在“存异”中有效“求同”的高超政治艺术。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要求统战工作紧跟时代发展,他指出,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他敏锐地指出要关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和互联网等新领域,强调“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sup>[79]</sup>,要“不断拓展协商方式和平台”<sup>[80]</sup>,确保统战工作跟上实践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这些实践方法的创新,深刻回应新时代社会结构变迁对统战工作提出的精准化、高效化挑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sup>[81]</sup>,一大批“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他们职业流动频繁,行为方式日益网络化,导致主要依靠行政组织体系的传统工作模式出现覆盖盲区。为应对这一挑战,统战工作必须在载体和覆盖模式上实现精准化、网络化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要关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以及互联网等新领域,要求统战工作突破物理边界,实现对社会新发展形态的无缝链接。其中,“亲清政商关系”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政商交往、高效服务民营经济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准则。而“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则明确将网络空间确立为统战工作的新阵地,旨在通过善用网络平台了解民意、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sup>[82]</sup>,推动统战工作实现对新兴领域和群体的有效覆盖与引导。

(三)制度体系的创新:以健全格局保障常态长效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sup>[83]</sup>。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推动统战工作制度的成熟定型,构建起支撑战略落地的“四梁八柱”,实现从原则要求到刚性制度保障的重大创新。

一是确立与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这一格局明确“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

关方面各负其责”<sup>[84]</sup>,从制度上破解长期存在的“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难题。

二是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理念和成功经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的制定实施,共同构成较为完备的统战工作制度体系,提高统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三是将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制度安排进行系统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sup>[85]</sup>,不仅要求党外代表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sup>[86]</sup>,更希望各民主党派成员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sup>[87]</sup>。这些体现了对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履职尽责的更高标准。

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旨在将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转化为统一战线这一强大法宝在国家治理中的显著效能。统一战线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广,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sup>[88]</sup>。过去统战工作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分散在不同系统或部门,整合利用程度不高,再加上资源投入与重点工作不匹配,促使统战工作在运行机制和工作模式上进行系统化、制度化的创新。构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从顶层设计上解决了协作问题,将统战工作从部门业务工作提升为需要全党行动、各方协作的系统工程。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基本法规的制定,将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固化为刚性制度,标志着统战工作进入了依规治理的新阶段。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着眼事业可持续发展,解决人才问题的长远战略举措。通过制度化、规范化选拔培养,确保多党合作事业后继有人,为统一战线事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 五、结语

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应时代之变迁、领时代之先声、立时代之潮头，不断解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适应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引领力。具体而言，在理论定位上，实现从“重要法宝”的策略性认知到“重大战略问题”的全局性跃升，将统一战线置于民族复兴伟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广阔视野中重新审视。在实践范畴上，在坚守并发展“五大关系”这一传统基本盘的同时，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深刻洞察，与时俱进地对原有工作方针进行系统推进。在策略方法上，创造性提出“同心圆论”“石榴籽论”“最大公约数论”等一系列形象生动、蕴含哲理的标识性概念，推动统战工作从原则方针到可操作、可检验的科学方略与艺术方法的系统转化。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筑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四梁八柱”，彰显这一思想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sup>[89]</sup>，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sup>[90]</sup>，要深刻领会并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做到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坚持爱国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不断探索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团结引导的新方法、新载体，把统一战线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效能，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 参考文献：

- [1][4][16][17][22][24][25][26][28][29][46][47][49][52][55][60][69][70][78][79][8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8、609、608-609、609、609、297、401、609、609、269、566、566、270、502、608、259、33、268、269、610、226.
- [2][54][81]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119、120.
- [3][15][19][20][21][23][35][36][39][45][50][58][59][64][65][66][68][72][73][7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2、351、353、351、318、352、353、32、66、33、33、48、33、357、358、357、358、356、356、35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04.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5.
- [7]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 [8]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6.
-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3.
- [10]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3.
- [11]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精神解答[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9.
- [12][48][74][84][85]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求是，2024(2)：5、7、7、7、7.
- [13][14][1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3-4、4、3.
- [27] 习近平.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J].求是，2024(6)：4-5.
- [30]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0.
- [31]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58—196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379.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214.
- [33] 江泽民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86.
- [34] 胡锦涛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71.
- [37][77]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30、157.
- [38][8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9、6.
- [40][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59、137.
- [41]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3): 4.
- [42][4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3、9.
- [44] 列宁全集: 第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33.
- [51] 习近平致信祝贺欧美同学会成立 110 周年强调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聚天下英才广集创造伟力 [N]. 人民日报, 2023-10-22(1).
- [56][57] 习近平.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4-12-21(2)、(2).
- [61] 中共中央统战部. 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J]. 求是, 2025(5): 35.
- [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五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88.
-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二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69.
- [6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17.
- [7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743.
- [7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79.
- [8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1.
- [86]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 人民日报, 2015-05-21(1).
- [87]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N]. 人民日报, 2022-01-30(1).
- [88]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奋力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J]. 求是, 2021(2): 34.
- [89]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90]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责任编辑: 吉强

# 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的在场样态、现实困境及创新路径

颜苗苗

**摘要:**新时代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是加快构建统战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网络空间生态治理、营造良好网络话语环境的迫切要求,是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发挥法宝作用的优势所在。从在场样态看,网络空间统战话语表现形式呈多元融合特征,涵盖理论性、实践性、制度性、价值性四类核心话语。当前,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主要面临话语表达未能完全适应网络传播规律、信息技术引发不利影响、国际话语环境趋于复杂等现实问题。对此,需从优化舆论生态、创新话语内容、协同话语主体、革新传播方式等维度协同发力,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传播力的新时代统战话语体系。

**关键词:**统战话语;网络空间;话语建构;网络生态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网络空间已成为思想激荡、价值观碰撞、意识形态冲突的重要场域。各类错误的文化思潮影响了网络用户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对维护国家安全造成严峻挑战,也对新时代统战话语建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如何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变成最大增量,已成为提升统战话语效能亟待回答的时代课题。

## 一、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的在场样态

统战话语是一个融通历史与现实、聚合理论与实践、统摄制度与价值、贯通专业与大众的动态话语集合。生成背景的多元性、作用场域的广泛性以及价值指向的深刻性,使得对统战话语的全景式把握与结构化呈现颇具挑战。从功能维度审视,其核心话语可提炼为理论性话语、实践性话语、制度性话语与价值性话语四大类型。四者交织共生,共同构成以理论为基、以实践为用、以制度为纲、以价值为魂的有机整体,构筑起统

收稿日期:2025-12-02

作者简介:颜苗苗,江苏海洋大学校聘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4CDJ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战理念的立体化表达框架。

### （一）理论性话语

统战理论性话语作为统战话语体系的核心构成，是对统一战线基本概念、原理、规律的系统阐述与理论概括，是以科学思维方法和理论工具对统战领域现象、关系、问题进行抽象化、概念化、逻辑化处理后形成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语言表述体系。这类话语既回应了“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更为话语结构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与理论正当性。理论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论述与论断之中，构成了统战工作的根本思想指引与行动指南，是统战领域的关键性话语资源。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四个维度。一是概念的高度凝练性。如“重要法宝”“最大政治”“同心圆”等表述，以极简的语言承载深厚的战略意涵和历史经验，实现了从具体实践到抽象概念的升华，既保留了实践的鲜活感，又赋予其理论的生命力。二是逻辑的严密完整性。话语内部各命题相互支撑，从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到其凝心聚力的功能定位、求同存异的工作原则乃至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形成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三是表述的规范稳定性。其语言风格严谨权威，常见于党的重要文件、重要理论著作及政策表述中，具有较高的理论认同度和长期适用性，既确保了话语的权威性，又为实践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参照。四是价值的鲜明引领性。理论性话语始终贯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强调党的领导，并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将价值导向融入理论建构每一环节，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在统战话语体系中，理论性话语居于固本培元、引领发展的根基地位，是“元话语”和理论基石，为实践性话语提供行动依据，为制度性话语确立设计原则，为价值性话语构筑意义内核，更深度融入统战事业发展各方面，以思想穿透力

与理论感召力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成为统一战线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思想罗盘”。统战理论性话语既是科学认识统一战线的思想武器，也是指导统战实践的纲领，更是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精神旗帜，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引领力和实践塑造力，构成了整个话语体系的方向标杆，引领着统战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汇聚民族复兴伟力筑牢坚实的思想理论根基。

### （二）实践性话语

统战实践性话语作为统战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统一战线实际工作推进、具体行动落实过程中的操作策略、实施方法、实践经验等进行系统梳理和生动表达的语言表述体系，是具有直接指导实践意义的话语集合。这一话语不仅精准回应了统战工作“怎么做”的方法论难题，更通过实践检验与成效验证，为话语内容赋予操作的可行性与实践的有效性。实践性话语集中呈现了统战工作实践经验与创新创造，是阐释统战实践模式的规范化话语表达系统，也是统战工作领域中鲜活且实用的话语资源。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四重维度。一是目标导向的现实性。统战话语建构坚持紧扣中心任务，服务现实需求，具有鲜明的现实意识和结果导向，无论是革命年代破解阶级矛盾，还是建设时期应对发展难题，抑或是新时代聚焦民族复兴，始终为解决特定历史阶段的突出矛盾、实现具体奋斗目标提供行动指引。二是表达方式的适应性。统战实践性话语能够根据不同场景、对象和问题，灵活调整表述方式和内容侧重点，以更有效契合统战实践需求，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和工作成效。三是阶级立场的鲜明性。从革命时期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sup>[1]</sup>，到新时代“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sup>[2]</sup>，统战话语的根本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权，这也是确保统一战线在正确方向上前进的实践底线。四是群众基础的广泛性。统一战线的实践成效依赖于广大群众的理解、认同与参与，其话语必须采用大众易懂易共鸣的表达，将抽象的统战策略转

化为群众可感知、可参与的具体行动。

在统战话语体系中，实践性话语居于赋能实践的重要地位，是连接理论性话语与实际工作的桥梁和纽带，为理论性话语提供实践验证土壤，为制度性话语提供实施路径支撑，为价值性话语提供现实彰显载体。统战实践性话语既是将统战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纽带，也是检验统战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更是推动统战事业发展的实践引擎，为统战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与行动保障。

### （三）制度性话语

统战制度性话语作为统战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柱，是对统一战线制度安排、规则体系、运行机制等进行系统阐释与规范表达的语言表述体系，是具有权威约束力与普遍适用性的话语集合。这一话语体系不仅回应了“如何依规运行”的制度追问，更通过制度建构与规则完善，为统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规范依据，成为统战事业规范有序发展的制度根基。制度性话语是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与统战工作特点，通过探索、创新、完善形成的制度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制度体现，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各类统战政策法规及党内相关制度规定中，构成了规范开展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规则。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四重维度。一是规范内核的刚性约束性。制度性话语的本质是“制度的语言表达”，必然内嵌刚性的规范约束属性，明确界定统战工作的权责边界、运行流程与行为准则，为各类统战主体提供不可随意突破的行动底线，也推动统战工作进入“按制度、依规范”的有序轨道。二是内容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制度性话语依托统战制度的长期积淀与成熟定型，其核心内容具有鲜明稳定性与延续性，成为统战话语体系的“压舱石”。随着时代发展，制度性话语在原有核心内涵基础上进行细化完善，这种稳定性为统战工作提供了持续的方向指引与政策预期。三是权威来

源的法定依据性。制度性话语的权威并非源于主观表述，而是植根于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文本，具有明确的法定或制度依据。因此，制度性话语在统战工作中具备不容置疑的指导地位与执行效力。四是实践衔接的系统关联性。制度性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统战理论性话语、实践性话语、价值性话语形成紧密衔接的系统关联，既为其他类型话语提供制度支撑，也依赖其他话语实现落地转化，共同构成完整的统战话语逻辑。

在统战话语体系中，制度性话语居于定规立矩、强基保障的权威地位，是“元规则”和制度根基，不仅是对统战制度的语言呈现，更在统战工作全流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统战制度性话语既是规范统战工作的刚性准则，也是保障统战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凝聚力量、维护团结稳定的制度纽带。其展现出强大的规范力、保障力和创新引导力，构筑起整个话语体系的制度骨架与稳定基石，推动着统战事业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上行稳致远，为汇聚民族复兴伟力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 （四）价值性话语

统战价值性话语作为统战话语体系的精神内核，是对统一战线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精神追求、目标愿景等进行深刻阐释与价值提炼的语言表述体系，是具有强大感召力与引领力的话语集合。这一话语不仅回应了“统一战线为何而存在”的价值追问，更通过价值阐释与精神弘扬，为统战工作注入深厚的精神底蕴与强大的精神动力。价值性话语是党始终坚守的价值准则与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价值升华。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四重维度。一是价值导向的鲜明性。统战价值性话语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始终以党和国家的核心目标、根本立场为锚点。这既体现在“宏观目标”的引领上，始终将统一战线的价值追求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紧密绑定，为不同群体指明共同奋斗方向；也贯穿于具体立场的传递中，即始终维

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不同群体的合理诉求，让价值性话语成为连接“国家目标”与“个体诉求”的精神纽带，确保统一战线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二是情感共鸣的深刻性。统战价值性话语具备强大的情感共鸣能力，通过贴近人心的表达唤起不同群体的情感共鸣，让统战价值理念从“认知层面”深入“情感层面”。三是价值传承的延续性。统一战线价值性话语是长期的统战实践中形成的稳定的精神内核，其核心价值理念具有跨历史的延续性，既传承革命年代的精神基因，又在新时代具有新内涵，形成“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价值脉络。这种延续性集中体现在对“团结”“共识”“初心”等核心概念的坚守上，成为连接不同历史时期统战使命的精神纽带，也让统战工作对象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形成传承与接力。四是受众适配的针对性。统战价值性话语立足群体差异，精准调整价值传递的侧重点与表达方式，有效触达不同群体的思想关切与价值共鸣点，推动统战价值理念真正入脑入心。

在统战话语体系中，价值性话语居于举旗定向、统揽全局的核心地位，是“元价值”和价值源泉，为理论性话语锚定深层价值导向，为实践性话语注入持久精神动力，为制度性话语筑牢价值支撑。统战价值性话语是统战工作的精神支柱，是凝聚各方力量的情感纽带，更是引领统战事业发展的思想灯塔，其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引领力，构成了整个话语体系的价值灵魂与精神旗帜。

## 二、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的现实困境

### （一）话语表达未能完全适应网络传播规律

从话语内容看，依然存在内容供给与需求错位的问题。部分统战话语内容仍停留在传统的政策解读、理论阐释层面，多采用宏大叙事框架，对网络空间中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差异化认知关注不足。从话语表达形式看，话语表达的创新性与感染力不足。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短视频、直播等轻量化、可视化的叙事形式更易吸引用户

注意力，但当前部分统战话语仍以文字报道、专题文章等传统形式为主，叙事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对网络传播特征的精准把握。同时，在表达风格上，部分内容仍存在说教式倾向，未能注重网络化、生活化表达，导致话语传播的穿透力与影响力受限。从话语表达的主体看，各主体间的协同性与联动性欠缺。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需要党委、统战工作对象、社会组织、媒体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但当前各主体间的叙事传播缺乏有效联动，难以形成协同效应，进而影响话语在网络空间的覆盖面与渗透力。上述问题，削弱了统战话语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效能，制约了其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功能发挥。

### （二）信息技术引发不利影响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统战话语建构提供了新机遇、新手段，但也有新风险、新挑战。其一，网络空间中多元异质的价值观客观上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阵地，加大了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特别是，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发动网络认知战、舆论战，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统战话语建构网络环境。其二，受网络用户社会交往、信息需求，以及算法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网络传播中的圈层化现象明显。网络用户更愿意接收他们偏好的信息内容，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在不同的异质圈层间筑起话语壁垒。这导致主流话语内容广范围扩散受阻，消解了统战话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三，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最主要、最广泛的传播场域，“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sup>[3]</sup>。在这样的舆论场中，话语表达的主体日趋多元化、多中心化，导致官方话语同非官方话语的互动与博弈不断增强，这给统战话语建构增加了难度。其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开始普及，但生成式人工智能自我生成或被用于制造“真实”的假信息等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各种看似真实的虚假信息不断干扰网络用户的认知和判断，这给统战话语建构造成

新的障碍。

### （三）国际话语环境趋于复杂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部分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展，企图通过认知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等进行抹黑、打压，并攻击统一战线。其中，频频制造统战话语争端，对新型政党制度、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进行丑化抹黑，在治疆治藏、涉港涉澳、台海问题上妄图干扰破坏，诬称中国海外统战工作是“政治干涉”“政治渗透”，炮制所谓的“统战干涉论”“侨务干涉论”等，甚至将“中国问题”作为本国选举的叙事选题，对中国统战工作进行歪曲性报道。这些都不断恶化了统战话语的国际传播环境，给统战话语建构带来极大的挑战。

## 三、新时代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的创新路径

### （一）优化整体舆论生态，营造良好网络话语环境

话语环境是影响话语建构的重要外源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sup>[4]</sup>当前，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离不开和谐稳定的话语环境，必须不断优化整体舆论生态，抓住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积极回应各界舆论关切，大力推动话语场域拓展，不断增强统战话语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

一是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升级与广泛运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边界不断融合，共同构成信息和舆论传播的舞台，统战话语建构要重视在网络空间发力，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网络平台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已有法律法规在网络空间的执行力度，及时制止网络平台违法违规行，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效

能，不断净化网络生态。要不断健全网络媒介管理制度，加强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将现代信息技术合理运用于网络空间治理当中，实现网络信息传播资源的合理分配与调整，提升网络空间的监管水平。要不断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强化网络用户的媒介素养教育，“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sup>[5]</sup>，减少虚假、负面、低俗信息的传播。

二是积极营造良好的国际话语环境。西方对华认知战的本质是遏制中国发展，通过垄断信息、操纵舆论等，丑化、妖魔化中国，以维持霸权地位。对此，必须科学研判各风险要素，重点防控话语博弈风险点，积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发出中国声音。一方面，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共同话语地位。当前国际话语博弈加剧，这需要积极营造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环境，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交往和情感互动，同他们共同争取、建构与自身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地位，以良好的国际关系助力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话语格局。另一方面，有效回应海外关切，答疑解惑以寻求共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统一战线的曲解与误读，讲好中国统战故事，传播好中国统战声音，推进统战话语在交流与互动中不断优化。

### （二）推动话语内容创新，增强统战话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话语内容是客观、真实反映并契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思维的逻辑表达，是话语建构的核心要素，也是体现话语力量和底气的重要源头，决定着话语阐释力、吸引力、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创新内容和载体”<sup>[6]</sup>。统战话语内容创新应坚持守正创新，精准把握网络空间传播规律与时代发展新要求，不断优化话语供给质量，让统战话语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时代感。

一是加强统战话语的价值性引领。统战话语

是“价值共识的传播载体”，网络空间的多中心化特征更需强化价值引领，避免话语传播陷入碎片化、浅表化困境。对此，必须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统战元素，通过创造性转化将其融入话语内核，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成为统战话语的坚实支撑。针对不同统战群体的价值关切，应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提炼差异化且共通的价值表达，既回应特定群体的个性化诉求，又凝聚最广泛的思想共识，有效规避“一刀切”导致的话语失效问题。面对网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以及统战工作被污名化现象，必须以精准化的话语阐释予以有力回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析本质的方式澄清认知误区、正本清源，确保统战话语在多元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始终保持方向不偏、立场不移。这种价值引领既为凝聚共识提供了根本支撑，更使统战话语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彰显出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与行动感召力，最终实现从“价值传递”到“价值认同”的深层转化。

二是强化统战话语的时代性表达。恩格斯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sup>[7]</sup>一方面，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主动适应网络空间传播规律与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行为特征，将抽象的统战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话语内容，以贴合时代场景的叙事方式回应统战工作对象的合理诉求，使统战话语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让网络空间成为凝聚共识的强磁场。另一方面，及时了解、主动回应网络空间中公众高度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以精准对接需求为导向构建话语供给体系。从统一战线“协调关系、汇聚力量”的职能定位出发，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与思路，提供有效的话语供给。这种扎根现实的精准表达既能打破“统战工作务虚”的认知误区；又可穿透“信息茧房”与圈层壁垒，彰显统战工作

在统筹利益协调、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务实价值，实现从“理论渗透”到“价值共鸣”的转化；更能让公众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知统战理念的温度与力度，最终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认知跃升。

三是突出统战话语的故事化叙事。统战话语叙事应坚持用统战工作实践涵养统战话语内容，用统战话语内容阐释统战工作实践。依托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工作实践，挖掘鲜活生动的统战故事，提炼具有时代辨识度、群体共鸣度的话语标识。面对网络空间议程设置圈层化、泛娱乐化、流量化趋向，统战话语需避免娱乐化、同质化倾向，既要把握好话语内容的权威性、思想性，统筹理论话语、实践话语、制度话语、价值话语的协同发展，又要规避宏大叙事与抽象理论带来的疏离感，在保障话语内容严肃性的前提下，让话语表达更贴近网络用户的语言习惯。

（三）加强话语主体协同，凝聚统战话语传播的合力

网络空间统战话语建构不是单一主体的行为，需要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党委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多方参与、协同发力”的主体协同格局，在统战话语建构中形成“方向引领—统筹协调—多元执行—效能聚合”的闭环协同。既要确保统战话语的意识形态安全与正确导向，又要充分释放多元主体的专业优势和话语活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聚合效应，实现理论性话语的深度阐释、实践性话语的真实传播、制度性话语的有效落地、价值性话语的广泛共鸣。

一是明确主体定位，夯实协同联动基础。党委部门掌握着统战话语的核心方向与意识形态导向，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坚守党的话语核心主体地位，确保统战话语建构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统战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对统战话语建构的组织协调、内容把关与效果评估，整合统战系统内部资源，形成话语传播的合力。要激活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主体活

力。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工作对象，分布广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社会影响力与话语表达能力，鼓励他们以自身视角解读统战政策、传播统战理念，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话语传播格局。此外，可实时引导广大网络用户参与话语建构与传播，鼓励他们分享身边的统战故事，让统战话语建构更加贴近群众、反映民意。

二是搭建协同机制，打通联动贯通渠道。由统战部门牵头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话语建构工作推进会，统筹协调舆论引导、平台建设、资源共享等工作，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统战话语传播协同体系，确保各主体思想同频、行动同步。健全分工协作机制，实现“各尽其能、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基于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明确分工协作的重点领域与责任边界，聚焦话语内容共创、多层级传播网络搭建等重要环节，将统战部门的政策引领、工作对象的内容供给、技术主体的技术支撑、媒体平台的传播放大形成合力，提升话语建构的系统性与实效性。建立多元化激励体系，对积极参与统战话语生产传播且成效显著的主体，通过表彰奖励、资源倾斜、宣传推广等方式予以肯定。

#### （四）革新话语传播方式，提升统战话语的覆盖面与穿透力

为打破“单向灌输”“圈层内循环”等传播困境，需依托融媒体技术优势，打破传统传播边界，推动统战话语在网络空间的广域化传播，建构多渠道、多形态、多场景的传播模式，推动统战话语实现从“传播者主导”向“用户需求导向”、从“单点传播”到“全域覆盖”、从“被动接收”到“主动认同”的深度转变，实现统战话语的全方位、立体化传播。

一是拓展传播载体覆盖面。网络空间统战话语传播需进行全媒体布局与多模态适配。一方面，在深耕微信、微博等平台的同时，加快布局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和今日头条等信息分发平台，实现传播载体全覆盖。积极借助可视化、轻量化等技

术手段，对理论性、实践性、制度性、价值性四类话语进行转化创新；建立“主流话语优先推荐”机制，利用算法推动话语的精准触达，并避免算法偏见对统战话语的边缘化。另一方面，针对不同载体的传播特性进行内容定制化生产，如在短视频平台推出典型人物、故事等轻量化视频，在图文平台发布深度调研、政策解读文章，通过“一内容多形态”的适配策略，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内容投放和话语调适。

二是推动跨圈层传播。以大数据分析 with 智能算法技术为支撑，精准研判网络舆情热点、不同圈层用户的特征及话语需求差异，推动统战话语分众化、差异化传播。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精准滴灌”，破解传统传播中“话语错位”“供需脱节”的难题。通过全方位、立体化传播打破圈层隔阂与数字鸿沟，推动统战话语从“圈层内循环”走向“跨圈层传播”。

三是加强互动式传播。树立“双向互动、平等对话、共创共享”的一体化传播思维。打破“显性线下单向传播”与“隐性线上多向传播”的割裂状态，实现话语传播“线上线下多向流动”。搭建低门槛互动平台，促进平等对话，鼓励多主体深度参与话语共创，实现从“单向传播”到“双向共情”的转型。创新互动传播形式，通过直播访谈、线上沙龙、圆桌论坛等形式，以“对话式”“分享式”传播替代“宣讲式”“说教式”传播，增强话语的亲和力与说服力。当前，应立足网络空间传播特征，依托融媒体技术赋能优势，紧扣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精准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加强统战话语建构，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转化为话语优势，让统战理念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让统战声音深入人心，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既是顺应时代变革、提升统战工作实效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的重要举措。在未来的实

践中，需持续关注网络空间的发展变化，不断探索统战话语建构的新路径、新方法，推动统战话语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2.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8.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5.

[4][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6、324.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N].人民日报，2025-11-30(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责任编辑：吉强

# 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三层维度和践行机制

许川川 李艳艳 陈 涛

**摘要:**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应有之义,更是以高校这一育人主阵地凝聚千万学子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把握三层维度:在有形层面,凭载体激活记忆,构建身份认同空间;在有感层面,借叙事引领共鸣,深化情感认同层次;在有效层面,将认知付诸行动,达成育人实效目标。基于此,以技术之形构建具象化的教育引导机制、以情感之能促成认同性的共识内化机制、以知行之效达成生活化的自觉践行机制是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恰切之道。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日常实践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工作。关于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

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sup>[1]</sup>这一论述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更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层维度,即有形、有感、有效。高校肩负着为祖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为工作指引,切实把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和机制,提升育人实效,成为铸

收稿日期:2025-10-27

**作者简介:**许川川,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意识形态;李艳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意识形态;陈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十四五教育规划重点课题“行业高校新疆籍、西藏籍少数民族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B/2023/01/44)、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要素谱系与机制构建研究”(24MLB00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网络思政视域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机制构建研究”(2023SJJZDSZ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强阵地。

### 一、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sup>[2]</sup>。高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时代新人的主阵地,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效对培养时代新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 (一) 立德树人: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培养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sup>[3]</sup>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迫切需要具有强烈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新时代青年。高校通过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结合的教学环节、融入课堂教学和实践育人相协调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校园文化和社会环境相贯通的教学机制中,从而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各民族安定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进而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自觉,在学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内涵的过程中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特别是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组织民族地区社会实践、举办民族文化活动等具体举措,让青年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从而自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 (二) 凝心聚力: 深化民族团结教育以营造和谐校园生态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巩固平等团结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高校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有助于基层党组织在反对分裂势力、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其次,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习俗、使用不同语言的各民族学生充分平等交流,推进各民族文化融会贯通,并引导学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文化、包容多元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融合不仅有助于构建平等、尊重、互助、和谐的校园环境,也为培育开放心态和包容精神的社会氛围奠定坚实基础,并最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最后,高校可以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加强对民族地区教育公平、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等问题的调研,整合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资源,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实践路径。这种文化引领和发展推动的双重作用,不仅体现在校园内部的文化融合,还延伸至社会层面,使高校成为培养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 (三) 使命担当: 强化国家战略意识以融入民族复兴伟业

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思想引领的高地,肩负着培养时代新人、传播思想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使命,在服务国家民族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sup>[4]</sup>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民族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日益成为国际博弈中的重要议题。高校为民族领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教育、科技、人才等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首先，高校通过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推动民族政策制定科学化。其次，通过加强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持，设立专项教育项目、开展技术培训与产业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助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最后，通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高水平论坛、出版多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讲好中华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传播中国经验与智慧，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维护全球民族事务的公平正义贡献力量。

## 二、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层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sup>[5]</sup> 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有其内在规律性，它并非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主体在头脑中对现实世界中的符号进行意义和情感加工的产物。不同群体面临独特的环境，其观念形成需要综合主体特点和环境特性来考量。因此，探究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层维度，需要从高校学生的认知结构、情感体验与实践参与三个方面协同推进。

### （一）有形层面：凭载体激活记忆，构建身份认同空间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在融合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华文化，这些文化通过历史文物、生活器具以及风俗习惯等得以呈现，它们是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需依托具象化、可视化、可

感知化的物质或文化载体，激活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脉络、文化传统的记忆，强化其情感联结，旨在增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

首先，物质载体具有文化记忆的“存储器”作用。高校利用校园建筑，如文化墙、展览馆、雕塑等载体，系统展示中华民族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及文化符号，将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象的实体形态，为学生理解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支撑。其次，空间建构是促进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可塑造具有象征意义的“共同体场域”，即富含中华民族文化元素的校园空间，该场域通过隐性塑造个体的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感知与体认共同体意识，在文化浸润中构建身份认知。最后，高校依托网络技术将物质载体与校园空间共同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激活和培育过程。通过对各民族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物质载体（如传统服饰、建筑形制、艺术珍品、仪式器物等）进行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建模与存储，构建可永久保存、即时调用的民族文化数字资源库，并搭建支持多人在线协作的互动式文化体验平台，使学生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身临其境地体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拟历史场景，深度理解文化共生脉络。

### （二）有感层面：借叙事引领共鸣，深化情感认同层次

各民族情感相通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生动的叙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鲜活的故事，通过讲述各民族携手奋斗、团结互助的真实事例，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推动其情感交流、消解文化隔阂，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意识。

首先，以“三个讲好”提升叙事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sup>[6]</sup>以生动的故事深化高校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一步强化共同体意识。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sup>[7]</sup>这要求高校学生认识到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疆域、共创文明成果、共御外侮的历史进程中凝结的价值观念,更需深刻体悟这些价值观念所承载的由历代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并传承的精神体系,如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品格、深沉厚重的爱国情怀、兼容并包的和合思想等。最后,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育的核心在于引导个体深度理解与情感共鸣,高校要讲清楚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基础上提炼并发展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

(三)有效层面:将认知付诸行动,达成育人实效目标

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重要的是推动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自觉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各族儿女的交流交往交融,并主动担负起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扎根与巩固,依赖于现实场域中的持续性浸润。作为高校核心主体的学生,正是在跨民族学习小组共同完成课题、

协作筹备民族文化节庆活动、混宿制下的生活互助等日常化的互动实践中,通过频繁深入的平等交往,逐渐消解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与隔阂,增进对不同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真切了解,促进相互欣赏与尊重,实现彼此间的自觉性和真诚性交往。进而,伴随着基于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实践的体验日益丰富,个体的民族认同感与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持续深化,最终在情感与价值层面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次铸牢与持久性巩固。此种内化不仅体现为认知层面的认同,更体现为情感层面的归属与行动层面的自觉。学生只有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此基础上将共同体意识切实内化于心,并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自觉行动,方能激发其传播共同体意识的主动性和责任感,自觉成为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与传播者。

### 三、高校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sup>[8]</sup>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机制,是推动高校高质量做好民族工作、培育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为此,高校需遵循有形有感有效的逻辑理路,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机制。

(一)载体依托:以技术之形构建具象化的教育引导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sup>[9]</sup>网络信息技术是有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充分运用这一技术,可助力高校构建具象化的教育引导机制。

首先,强化数字资源库整合机制。构建网络融入新生态,依托互联网全域覆盖优势,利用短视频、社交媒体、在线课程等融媒体平台,创新优秀文化融入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转化为育人素材,打通校内外资源壁垒,打造“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资源矩阵,实现精准化、立体化传播。其次,创新新媒体传播机制。依托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及校园APP),通过图文、视频、互动问答等多元化形式系统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提升教育活动的趣味性与吸引力。以“民族团结故事”“文化交融案例”等主题内容为载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情感共鸣,有效引导其主动关注并参与相关教育活动。最后,建立智能反馈机制。利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实时收集学生对教育内容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设计,确保教育效果持续提升。通过发放智能问卷、设立在线讨论区等方式,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认知变化,为教师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教育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实现教育引导的精准化与长效化。

(二) 过程深化:以情感之能促成认同性的共识内化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强纽带,各族人民都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sup>[10]</sup>情感认同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进一步完善共识内化机制。

首先,健全党对高校民族工作的领导机制。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管高校育人大局、高校工作全覆盖以及制度建设上。需要建立党领导下的严密完备的教育规范制度、实施制度、监督制度和保障制度,特别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党建考核,紧抓各级党委负责人关于该项工作的述职评议工作,以党的领导深化铸牢工作。其次,完善学术支撑机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战略性布局,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

史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加速推进国家安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级学科建设,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学术研究范式,为铸牢工作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制度保障。再次,强化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性、分层次、递进式融入各学段教材体系、课堂教学与学生认知,着力构建覆盖所有学科、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将“五个认同”教育覆盖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全过程,以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增强高校学生的情感认同。最后,在促进学生个体内化的同时,搭建学生主动传播机制。该机制旨在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积极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通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等方式,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校可通过搭建传播平台、组建宣讲团队、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等途径,鼓励学生主动发声,使共同体意识在社会场域中得到认同与弘扬,实现教育效果的延伸与深化。

(三) 目标实现:以知行之效达成生活化的自觉践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sup>[11]</sup>在高校日常教学生活实践中构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机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起到潜移默化、久久为功的作用。

首先,构建校园浸润机制。这要求教师、辅导员、行政管理者、后勤服务人员等教育主体在课堂教学、校园生活、管理服务、环境营造等全方位场域中,系统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元素,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例如,在相关课堂教学中融入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案例;在校园生活中常态化组织跨民族结对交流、共庆传统节日的联谊活动;在管理服务中体现平等尊重、包容多样的原则;在环境建设中展现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尤其需要精心设计并

实施具有体验性、协作性的融合实践项目，如跨学科民族地区主题调研、开展多民族学生团队合作的社区志愿服务、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技艺传习工坊、组织校园民族文化周展演等。其次，强化学生交往联动机制。传统的理论灌输、单向宣讲等教育方式，在吸引力、互动性和解决深层次思想困惑方面，已难以完全满足新时代青年学生的认知习惯和多元化、个性化的实践需求，其创新性与时代发展要求脱节。这就要求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实现教育生活化，推动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交往联动，通过夯实师生关系、家校关系、朋辈关系等提升教育效果。最后，完善效果评价和优化机制。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访谈分析、行为观察等方式，从认知水平、情感认同、行为表现等维度对大学生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持续完善动态反馈机制，借助定期总结与数据分析等方式，

及时发现教育过程中的薄弱之处，优化课程设置、活动形式以及宣传策略。

####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43.
- [2][4][5][8][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 北京：外  
文出版社，2022：245、245、245、247、244.
- [3][6]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N].  
人民日报，2024-06-21(1)、(1).
- [7][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300、301.
- [10]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6.

责任编辑：杨玲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内在机理、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韩 慧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自洽性与现实可能性，它依托制度主体优势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通过五大运行机制落实和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实践，依托制度规范体系指导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通过社会认知、社会认同和社会自信衍生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识与支持。但客观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仍存在制度主体在场但参与性不强、运行机制完整但实效性不显、制度规范初具规模但程序化不足、国内外共识初步形成但有待加强等问题，影响了人民当家作主效能。新时代，要坚持系统思维，提升制度主体能力，健全运行机制，完善体系规范，增强社会共识，全面拓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系统思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创新形式，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在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中彰显出显著优势，在历史规律性与人民主体性深度贯通中呈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与强大的制度效能，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

发展的政党制度保障。新征程，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立足“两个结合”，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机理，从现实逻辑上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限制性因素，从未来向路上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机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上高度契合、相辅相成，在历史上同程同向、相

收稿日期：2025-11-26

作者简介：韩慧，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研究”（21BKS19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互促成，在现实中高频互动、协同共进，这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自洽性与现实可能性。“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制度，但政党制度形态则决定民主政治的运行形态。”<sup>[1]</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上属于民主制度，它“源于中国民主的内在本质要求”<sup>[2]</sup>，因人民民主而生、为人民民主而行，从建立之日起就承载着中国人民对当家作主的热切期望，承担着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心使命，具有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必然性与逻辑性。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主体优势升华全过程人民民主品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sup>[3]</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主体的自身优势、民主功能与合作关系，有效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充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蕴含的“民主价值取向的人民性”<sup>[4]</sup>，全面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sup>[5]</sup>，实现了对西方“狭隘民主”“断点民主”“虚伪民主”“装饰民主”的根本超越。

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高度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始终代表与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都是在追求民主的历史方位中展开自身活动”<sup>[6]</sup>。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and 参政力量，具有进步性与广泛性，代表与表达各自所联系的各阶层界别的利益与意愿。多元主体不仅“实现了先进性与进步性、主导性与主动性的有机结合”<sup>[7]</sup>，而且在民主与团结的相互贯通中，依托统一战线激发一切爱国力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通过利益代表的叠加效应和政治参与的最大动员“实现了对民主手段和民主目标增量赋权的双重超越”<sup>[8]</sup>，克服了资产阶级政党宣称代表全民利益而实际上只维护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狭隘

性，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广泛。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具有发展民主的高度使命感，开辟了以党内民主引领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化通道。各民主党派享有参政权利，通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有效促成国家政权行使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多元主体在民主与高效的有机统一中突破了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零和博弈”逻辑，打破了资本主义民主下“人民大众形式有权、少数精英实际弄权、资本集团实质掌权的治理主体格局”<sup>[9]</sup>，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真实。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sup>[10]</sup>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聚焦“国之大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依托智慧与资源优势，将“民生关切”纳入议政过程。多元主体通过共商共治共享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民主与民生的有机结合中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管用。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运行机制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制、多党合作机制、参政议政机制、政治协商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五大运行机制自成体系而又相互联动，“具有明显的操作性和适应新要求的变动性”<sup>[11]</sup>，它们“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契合，与‘一体多面’的国家治理结构相呼应”<sup>[12]</sup>，并在国家治理中协同落实、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实现了“民主过程的全链条涵盖、民主层级的全方位拓展以及民主议题的全领域覆盖”<sup>[13]</sup>。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制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有效落实与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推进民主职能和集中统一功能，破解了民主与高效兼容难题，克服了西方民主的低效窘境，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局性与高效性。多党合作机制坚持多党合作优势与中心大局需求有机结合，把各个政党

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向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中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依托制度化渠道有效激发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员性与协同性。参政议政机制蕴含“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基本内涵，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考察调研、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等方式推动国家治理，保证了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统治，其最基本的形态就是人民在一起共同决定自己的事务，即直接民主。这种直接民主的最基本的实现方式就是协商。”<sup>[14]</sup> 政治协商机制通过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基本方式体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民主内涵，有效避免了单纯选举民主忽视少数群体利益的不足，“实现了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全体人民的民主、从选举才有的‘周期性民主’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变革”<sup>[15]</sup>，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sup>[16]</sup>的人民民主真谛。民主监督机制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通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式监督尤其是参政党对执政党“有组织、高层次的政治监督”<sup>[17]</sup>来促进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展示了民主监督的建设性”<sup>[18]</sup>，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的相互掣肘，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的运行路径。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规范体系指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由国家法律、党内规范、政协章程以及各民主党派章程等共同构成的规范体系，科学界定制度本身的属性地位与结构安排，规定制度主体的角色职能，规范政党关系，明确制度运行与功能发挥的组织载体、基本方式与具体程序等，进而指导与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一方面，现有规范在明确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定位基础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协商与监督的角色分工与职责定位，形成了“领导和执政主体一元”与“合作和参政主体多元”的“同心圆”结构，塑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团结合作、和谐共融”的政党关系，体现了团结、民主、和谐的本质属性，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组织载体与制度形式。另一方面，现有规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多党合作事业中的类型、原则与范围以及各参政党与参政力量议政建言、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与要求，规定了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原则范围与具体要求，在明确政党协商位于七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之首的基础上，具体规定了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方式方法、内容范围，明确了政治参与、利益代表、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功能发挥的渠道与方式，彰显了合作、参与、协商的基本精神，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实践指导与全面保障。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社会共识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通过知识层面的社会认知、情感层面的社会认同和信仰层面的社会自信，衍生与增强制度落实的社会共识与强大支持，进而保障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

社会成员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精神、特色优势、规范内容以及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机理等理论的全面认知，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落实的基础条件，能够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基本指引。社会成员在全面了解与深度参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础上，经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而形成情感支持与心理认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落实的自觉动力，能够为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深度支持。社会成员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推进全过程人民

民主方面，基于感性认知与情感认同、思想与行动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崇高信仰与高度自信，且由此衍生出自觉遵守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和坚决维护制度的坚强意志。这一意志能够突破“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sup>[19]</sup>的困境，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落实的最强动力，为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最坚实的支撑。总而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认知度、认同度和自信度越高，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识度和支持力就越强。如果社会成员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了解、不参与，不能形成深度认同和高度自信，那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因共识不足、支持不够而步履维艰。

##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问题

###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在场但参与性不强

主体参与性是影响与衡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变量。聚焦制度主体，“无论是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还是从参政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协商意识不强、协商伦理缺失、协商能力欠缺等问题”<sup>[20]</sup>，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践行协商民主的基础与动力，降低了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性。

首先，执政党的多党合作能力和民主协商意识有待提升。实践中，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或协商意识淡薄，不善于开展政党协商，有的以通报代替协商、想起来就协商或者很少协商；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精神了解不够透彻，对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采纳率比较低、采用反馈不及时。其次，民主党派参政意识不强，基本职能发挥不够。民主党派机关存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有些民主党派领导及成员对自身的性质地位、职能作用认识不到位，存在参政意识不强、参政动力不足、议政能力不强等问题，造成

职能发挥不够、社会认同度不高。最后，执政党执政能力与参政党参政能力呈现“强-弱”不均衡现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民主党派的参政是构成新型政党制度两个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方面，一方的能力和水平削弱都会影响另一方的提高。”<sup>[21]</sup>总体而言，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不断加强，呈现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执政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升，参政党科学参政、民主参政和依法参政水平稳步提高，这都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及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效能。但比较而言，执政党掌握着最重要最丰富的政治资源，而民主党派由于对自身的性质地位、职能作用认识不到位，研究与谋划工作的政治站位、理论深度、时代高度还不够，导致其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略显不足，仍然存在组织体系不健全、政党意识不强、理论建设滞后、章程纲领不清晰、参政动力不足、整体功能发挥不够、深入社会实际不彻底等问题。

###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制完整但实效性不显

机制实效性是影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最直接因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五大运行机制体系完整、均衡有序，但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仍存在随意而缺乏常规性、零散而缺乏协同性、有形式而缺乏实效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制运行中，有些地方尤其是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未能准确理解“政治领导”的要义，用管理或干涉代替领导，缺乏高屋建瓴的领导力。在多党合作机制运行中，存在政党合作形式单一、范围狭窄等问题，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的职位安排、后备队伍选拔等工作有待深化。在参政议政机制运行中，民主党派参政意识与能力不足，加之知情知政条件不够充分，信息渠道不够畅通，参政议政效果不彰。在政治协商机制运行中，制度主体协商意识不强、

协商能力不足，加之协商流程不够细化，造成协商中互动交流少、解释通报多，协商特色鲜明但实践不深入，且呈现出从中央到省、市级再到区县逐级减少和弱化的“上热中温下冷”现象。在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中，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监督职责弱化、监督规则操作性不强、监督方式单一，进一步制约了监督效能的发挥。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初具规模但程序化不足

规范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保障。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以国家宪法为引领、以党内规范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措施为补充的规范体系，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有规范仍有短板。

一方面，法阶不高、权威性不够。虽然宪法和党章明确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属性定位，但涉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大部分规范，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既不属于国家法律也不属于党内法规，存在规范位阶不高、权威性不够、系统性不强、实践效力不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性与效能。另一方面，程序化不足、指导性不强。现有涉及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和民主监督等的规范文件总体呈现出较强的宏观性与原则性，但缺乏具体要求与细节规定，存在程序化不足、操作性不强、指导性不够等问题。以政治协商规范为例，虽然围绕政治协商内容、范围、形式与方法作了明确规定，但对诸如“战略性的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等的具体标准、具体操作流程与评价反馈机制缺乏详细规定，这在为制度落实提供灵活创新空间的同时，也为变相执行、歪曲执行、选择执行等提供了机会。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识初步形成但有待加强

社会共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动力和环境支持。长期以来，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展示出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的世界奇迹。但不可否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仍面临“失语”甚至“挨骂”的困境，存在国内外共识度不高的问题。

从国外看，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仍处于强势，西方国家继续利用其在民主政治理论领域的话语霸权歪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西方学术界也囿于其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一党制”，误解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西方话语的‘倾轧’致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构建上还处于‘学徒状态’”<sup>[22]</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话语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从国内看，受国外思潮影响，加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未完全成熟定型，具有原创性和本土化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仍未完全建立，话语供给、传播与宣传等能力有限，优势效能尚未全面落地，民众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与认同、情感与自信度还不容乐观。这不利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建构，弱化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支持度。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立足“两个结合”在理论上深化研究，更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在实践中大胆创新，不断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化路径。

（一）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能力，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品质保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参与性主要是通过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能力尤其是民主能力来启动与保障的。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民主党派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sup>[23]</sup>

首先，以自我革命为抓手，不断提升执政党的领导、合作能力与民主执政能力。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民主集中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高党的民主协商能力与合作共事能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升党的社会治理能力，“使两种革命在实现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这个共同点上形成匹配兼容的能量耦合”<sup>[24]</sup>，以共治共建共享开拓与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场域与效能。其次，遵循“四新”“三好”总要求，提升参政党的责任意识与参政议政能力。按照“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组织建设为基础、履职能力建设为支撑、作风建设为抓手、制度建设为保障”的总体布局，着力提升民主党派的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不断强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责任意识，塑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所需要和相匹配的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素养。最后，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的互动建设，实现“强-强”均衡可持续发展。“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协调发展是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一条重要而宝贵的经验。”<sup>[25]</sup>执政党与参政党是互动共存的命运共同体，执政党建设引领、带动参政党建设，参政党建设协助、促动执政党建设，两者良性互动、协同共进、联合释能，既是“实现政党关系和谐的一项重要举措”<sup>[26]</sup>，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新时代，要正确把握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合理统筹政治资源在执政党与参政党间的配置，构建一套互动交流、协商合作与互相监督的规范化制度体系，搭建起信息共享、智慧共长、协商共建、治理共赢的多元化平台，打造包容多样而牢守同心圆心不动摇、尊重差异而尽最大努力缩小分歧面的命运共同体格局，最终达到执政效能、参政效能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最大化。

（二）健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内在驱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一套科学良性的运行机制来驱动。运行机制衍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执行与民主功能发挥的驱动力，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内在动能。

第一，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制，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航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优势。实践中，要通过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方式强化党的领导权威，赢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自觉认同，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强优势，引领与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航向与高效。第二，完善多党合作机制，放大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根据党中央相关规定，完善适时任用机制，充分考虑人员成熟度和岗位匹配度，科学安排与加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大、政府、司法等机关任职与合作共事，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智力优势以及多党派的合作优势，最大限度释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效能。第三，完善参政议政机制，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效果。积极搭建凝聚组织力量和参政议政的数字化平台，提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议题遴选、调查研究、政策论证、宣传动员等能力，完善知情明政、考察调研、工作联系等具体机制，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果。第四，完善政治协商机制，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政治协商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在价值、合作关系及其实现方式维度的精神凝练，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民主方式和更为有效的治理方式。新时代，要健全政治协商的制度规范，拓展与丰富协商渠道与形式，完善协商工作准备机制、协商过程实施机制、协商成果转化机制，厘清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议题、协商形式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强化各级党委就地方重大问题同民主党派和相关主体的真诚、务实协商，有效综合顶层协商与基层协商、专题协

商与常态协商，推动政治协商的平稳运行和全面铺开，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入发展。第五，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路径。通过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来明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权利与责任，依托界别优势和智力优势提升民主监督意识与能力，提升民主监督效果。着眼未来，要不断以运行机制的健全完善、持续优化、有效落地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强大动能，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成熟定型为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深度拓展作出中国贡献。

（三）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规范体系，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实践指导

政党制度规范的程序化与其对民主实践指导的精准性成正比，与制度民主效能水平成正比。换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有完备的规章政策在顶层设计层面予以支持”<sup>[27]</sup>。

一是从国家法律和党内规范相协调出发，加大制度规范的供给力度，塑造一套法阶较高、衔接有效、系统集成的规范体系。一方面，秉持国家法律和党内规范相协调原则，制定并完善涉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打造一套由国家意志和执政党意志双重保障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从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全国政协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健全各民主党派的内部规章制度，弘扬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政治文明的优良做法与社会规范，为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创新发展与职能发挥提供具体依据，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实践指导。二是针对“我国的政党制度关于政党之间的作用机制、作用方式缺乏明确的规定”<sup>[28]</sup>的现实，需要从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相统一出发，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程序化建设。在顶层设计层面，细化宏观的制度规范，不断完善和科学界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具体内容、标准、

范围、方式、程序等，细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落实和执行的反馈和评价程序，构建一整套切实可行、运行有效的程序化规范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的学习调研机制、议题论证机制、民主表决机制，完善成果报送与意见反馈机制、绩效考核与跟踪问效机制，以制度供给保障程序正义、以程序正义深化政党民主实践；在基层落实层面，各地根据顶层设计与规定，因地制宜制定与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和执行标准，实现顶层规范与地方细则的协同发力，进而从过程上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效性。

（四）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共识，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支持根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广泛深厚的社会共识和制度自信来保障。新时代，遵循“制度话语—制度认知—制度认同—制度自信”的逻辑，逐渐夯实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认同与自信，进而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及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支持根基。

首先，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制度话语体系。突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合作型政党制度优越于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事实，依靠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理论工作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海外研究者等主体共同努力、协同创新，以“实践经验、实践成果、实践事迹、实践精神为话语资源”<sup>[29]</sup>，论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义，构建融合中国基因与人类文明、平衡民族性与世界性、体现科学性与规律性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打造易于被国内外民众理解、接受与认同的话语体系。其次，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宣传机制，扩大社会宣传，构建基于全面认知基础上的制度认同。把握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创新传播方式，形成立体化、全方位的宣传格局，

提升整合与运用各类新媒体资源的能力，化被动为主动，在尊重差异、平等交流中善用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色与优势讲出来、讲清楚，实现话语表达精准传递，进而强化国内外民众的制度认知与制度认同。最后，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强化基于情感认同与理性考量的制度自信与制度信仰。“制度效能是构建话语体系、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前提。”<sup>[30]</sup>新时代，要以坚持与强化党的领导为保障，以夯实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为抓手，不断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并进一步转化为话语优势，达到实践上打动人、效能上惠及人、道理上说服人、形象上吸引人，进而强化制度自信与制度信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汇聚奋进力量。

#### 四、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高度契合性、同程同向性和高频互动性，这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内在必然性。新征程上，剖析与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机理，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参与性不强、机制时效性不显、规范程序化不足和社会共识度有待加强等问题，探索与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显得尤为迫切，对于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不仅具有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具有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质量的内在品质，它依托主体优势、运行机制、程序规范和社会共识，全面落实与展示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创造了民主与团结的相互贯通、民主与高效的辩证统一、民主与民生有机结合的高质量民主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狭隘民主”“断点民主”“虚伪民主”“装饰民主”的根本超越，为世

界政党政治发展和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1] 林尚立，赵宇峰. 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5.
- [2] 林尚立. 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64.
- [3]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28.
- [4] 何毅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N]. 人民日报，2025-02-26(9).
- [5] 樊鹏.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 [J]. 政治学研究，2021(4)：3.
- [6] 许忠明. 政治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理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4)：20.
- [7][18]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402、388.
- [8] 臧秀玲，康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优越性及其时代意蕴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2)：72.
- [9] 王炳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价值逻辑 [N]. 光明日报，2024-10-01(7).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0.
- [11] 王韶兴. 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 [J]. 政治学研究，2000(4)：25.
- [12] 王小鸿，王彩玲，徐锋，高国升. 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1)：99.
- [13] 刘乐明.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三个维度 [N]. 光明日报，2025-08-30(5).
- [14] 林尚立. 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94.
- [15] 赵宸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性文化基因及文明新形态研究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15.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8.

- [17] 臧秀玲, 贾晓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机制与路径——基于政治过程的分析视角[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 17.
- [19] 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0: 61.
- [20] 赵美艳, 孙洪波. 协商民主下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97.
- [21] 杨德山. 试论新型政党制度之“新”: 比较政党制度视角下的分析[J]. 教学与研究, 2019(3): 46.
- [22] 梁杰皓, 丁俊萍.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原则和价值[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4): 104.
- [2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 人民日报, 2020-01-15(1).
- [24] 齐卫平. 论勇于自我革命与领导社会革命相统一的逻辑关系[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5.
- [25] 董树彬. 协商民主发展的中国智慧[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7.
- [26] 宋连胜, 董树彬. 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的实现路径[J]. 政治学研究, 2011(3): 32.
- [27] 钟德涛, 付瑀.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J]. 思想理论战线, 2024(1): 2.
- [28] 刘红凇. 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00.
- [29] 齐道新.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与功能指向[J]. 探索, 2023(2): 4.
- [30] 郜鹏峰, 马拥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升及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J]. 领导科学, 2024(2): 34.

责任编辑: 王天海

# 唯物史观视角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宋德孝 李昕怡

**摘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分散的民族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精神,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三重理论创新。其一,重构历史主体范畴,即确立了人类整体利益优先原则,将世界各民族主体之间的对抗叙事,转变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至上的“新型世界主体”关系叙事。其二,创新文明形态论,即开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局限性的新道路、人类文明建设的新道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论。其三,开创全球治理新范式,即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

**关键词:**唯物史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历史理论;原创性贡献

在人类思想史上,世界历史问题一直都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古希腊时期,被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祖”的希罗多德就已将自己已知的空间领域视为一个世界,并就这个区域中发生的历史性事件进行叙事记录。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不仅对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更是对历史发展的本质进行了界定。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世界理性朝着无量数的方向进行,并通过自己的活动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黑格尔的历史哲

学对以往的哲学进行了系统归纳,并将其提升至辩证法与本体论的维度进行探讨,这对马克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希罗多德和维柯等人对世界历史理论作出的贡献,尤其批判性地反思和吸收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sup>[1]</sup>,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

收稿日期:2025-09-10

作者简介:宋德孝,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李昕怡,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1BKS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行动”<sup>[2]</sup>等论断，形成了内涵丰富、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世界历史理论。这一理论体系贯穿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可以说，马克思用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学思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深入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发展规律。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指明中国发展方向、促进世界共同进步的政治方略和治国理论。这些方略和理论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作出开创性贡献。

**一、确立了人类整体利益优先原则，将世界各民族主体之间的对抗叙事转变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至上的“新型世界主体”关系叙事，重塑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主体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世界局势变化、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了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在尊重各民族价值差异的基础上将整个世界视作一个整体，摒弃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价值对抗，关照全人类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讲，这一倡议将整个世界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对抗性叙事，转变为利益相关、共同发展的新型民族主体关系叙事，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人类整体、关照全球人的发展，倡导全人类共同进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

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sup>[3]</sup>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命运发展奠定的文化基础。

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将人类整体作为理论出发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4]</sup>因此，“现实的人”始终是世界历史的主体，社会生活的本质也就是由单个人所构成的类总和的本质。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作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拘泥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人民，始终以全世界人类的价值实现为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对世界各民族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守护，是对各民族主体普遍性生存发展需求的回应，更是对各民族安居乐业、人类共同繁荣的美好家园的追求。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概念的核心字眼是“人”或者“人类”，其基本诉求指向人类的更好生活与更好发展。

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促进世界各国的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sup>[5]</sup>也就是说，历史越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的社会关系就愈加丰富，人的发展就越来越向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来说，它始终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第一，和平与发展本就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保障。实践主体的生命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没有生命安全，就不存在实践主体，更不可能产生与实践主体相匹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sup>[6]</sup>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没有和平，一切都无从谈

起。”<sup>[7]</sup>第二，公平与正义是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基本原则。公平与正义是作为社会主体应享有的权利和追求的社会美德。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平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以及达成共识的基本美德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第三，民主与自由是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具体体现。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民主是充分发挥人民主观能动性的民主，自由亦是人民在共同体中获得的社会交往实践以及精神交往的自由。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sup>[8]</sup>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内核，亦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前提。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将世界视作一个辩证依存的多民族主体的整体，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主体理论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阶段，资产阶级作为全球市场扩张的背后推手，通过操控资本、规定市场游戏规则等方式，不断满足自身的资本利益追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其国际舞台上的支配地位。然而，正如资产阶级的获益要以无产阶级的损失为代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获益同样要以欠发达国家的损失为代价。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为一对矛盾，呈现出零和博弈的利益关系。这种情形下，世界各民族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对抗性为主，这种非此即彼的国际民族主体关系，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将每一个民族主体视作全球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而不是相互对抗或掠夺他人。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看来，各民族国家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主体，整个世界史就是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宣告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对抗性世界发展路径的历史局限性，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也重构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主体理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21世纪，尖锐的、深刻的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人类怎样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主要难题。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坚持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以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为根本诉求，以完善人类生存条件、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目标与最终归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主体已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演变扩展为全人类和各民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sup>[9]</sup>作为新时代解决人类问题的现实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以社会形态、阶级立场为绝对诉求，不搞冷战和对抗，努力在各民族的价值差异中寻找发展共同点，最终指向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与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因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消失，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趋尖锐，但与此同时，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日益增加。因此，实现不同地区的共同发展是当前人类发展的最大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以超越共存、合作共赢、化解差异性冲突为目标，它从全新的角度和实践方式出发，为全世界的共同进步提供可供参考的发展思路，实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 二、开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局限性的新道路、人类文明建设的新道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论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孕育了世界公认的灿若星河的文明成果，但就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与推进而言，相较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现

代化起步相对滞后，且发展历程充满曲折与挑战。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畏艰难、栉风沐雨，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尤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跃升到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篇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开创了一条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创建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论的理论创新。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遵循世界历史演进规律，超越西方不平等文明论，寻找符合人类发展的全新文明实践形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0]</sup>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政治判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锐意创新和文明自觉”<sup>[11]</sup>；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立足世界发展大势、植根自身发展实践，探索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发展新路径。

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创造规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12]</sup>资本主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但这并不代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经历资本主义时代，更不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通道。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线“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sup>[13]</sup>，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而是具有其自身特点的多样性的曲线化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人

类历史被卷入到资本统治一切的世界局面中，资本逻辑及其背后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一步步宣告着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与负面性，人类由此呼唤新的现代化形态和文明形态。在此背景下，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人们一直处于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虚假繁荣中，“人民的民主权利被资本当作政治买卖工具而无处实现”<sup>[14]</sup>，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由。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全球交流与日俱增，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异和文化对立逐渐削弱。由此，跨民族、跨国界的无产阶级大联合将逐渐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人类也终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中国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虽未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但却是中华民族在文明演进历程中的创新性探索，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路径与实践启示。

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不平等文明论的有力辩驳。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明形态相比，西方文明形态显然更为先进，但它以资本主义为制度载体，天然就具有严重的剥削性和不平等性。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15]</sup>在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人民生活艰难困苦等问题周而复始地循环，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文化表征。在这样的历史诱因下，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强有力地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并非福山所说的“文明的终结”，而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

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16]</sup>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之前必定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并不把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奉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形态，而将其界定为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实现辩证扬弃的全新文明实践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实现了对马克思人类文明共同发展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随着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应该以何种方式融入世界发展潮流，让民族发展顺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关心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sup>[17]</sup>一方面，中国倡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拘泥于民族个体利益，力争实现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民共同富裕，实现每个人的发展，“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sup>[18]</sup>。另一方面，中国在探索自身文明发展模式的同时，毫无保留地将其分享给世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也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在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情况下形成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文明形态。

在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与国之间长期奉行“大国主导，小国听从”的“国际法则”，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综合国力强的国家用军事手段或经济手段遏制弱国小国发展的局面。可以说，国家间的纷争持续演进且日趋尖锐，人类社会正陷入周而复始、矛盾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之中。近代以降，部分西方国家奉行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行径，并据此臆断中国发展壮大后必将走

其霸权扩张的老路。这显然是对中国国家性质与发展诉求的曲解，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刻意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对外界各类误解与偏见的有力回应和正向引领，更是中国为人类共同发展贡献的和平答卷。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分析中，曾提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诸多观点。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形成并奉献给世界的发展实践方略，是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演进擘画的未来文明图景。这一战略和设想，充满国际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关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发展思想的精髓，并且实现了创造性发展。

**三、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了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全局，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深刻思考，并针对当代全球性治理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创了全球治理的新范式。这一重大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精神内核的继承，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整体性思维，超越资本逻辑的侵略性，符合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发展速度不均衡导致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失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加快、综合实力增强。在此背景下，推动整体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当下时局交出的民族答卷。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世界历史在普遍交往的前提下逐渐形成，各民族和各地区从孤立、分散的状

态逐渐走向联结、交往的阶段。此时，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强，成为世界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此一来，随着世界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全球贸易空前增多、市场愈发扩大，全球性交往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历史必然。然而，资本全球化的目的并非普遍福祉，而是资本的最大限度增殖，而资本增殖天然带有侵略性与排他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sup>[19]</sup>因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sup>[20]</sup>。因此，从资本增长规律和资本运行逻辑来讲，资本主义本质上必然走向争抢与掠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全球化浪潮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人类的共同福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至全球，其固有的社会矛盾也会随之扩展至全球，进而上升为生产方式全球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矛盾也就由此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始终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即生产方式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数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家一般通过暴力掠夺、经济压制以及政治规训等方式来攫取利益。但如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资本主义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调整其掠夺方式，金融资本掠夺、意识形态渗透等剥夺性积累方式已经取代传统的暴力掠夺成为主要方式。在此前提下，经济战、贸易战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全球掠夺的新方式。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浪潮，为了抢占世界市场，公然割裂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全然不顾人类的共同福祉。从这个角度来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发展大势，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世界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符合马克思关于民族个体与世界

历史辩证关系的哲学精神。与维柯等历史主义者从单个民族历史或地方史出发研究历史的角度不同，马克思在以每一个具体民族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将世界看作普遍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思维中，致力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而寻找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现实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一辩证思维，既关注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又关心不同民族共同关切的议题，关心人类的整体进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西方国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不惜损害他国正当权益，甚至动辄推行逆全球化举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充分尊重每个民族的合理利益诉求，致力于推动整个世界互利共赢、和谐共进，这正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精神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提出了世界共赢新思路，实现了对马克思人类命运问题思考的原创性贡献

在全球化进程面临结构性变革的历史交汇点，数字化转型与地缘政治重组深刻重塑着国际秩序的基本样态。面对如此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21 世纪对马克思人类命运问题思考的中国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了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范式转换，还在价值论维度完成了从特殊利益向共同价值的认知跃迁，更在实践论领域开辟了从零和博弈向共生演进的转型路径。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范式转换的赓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使命交给世界人民，确立了世界人民在人类历史中的主体性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公道正义，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sup>[21]</sup>可以说，在人类面临发展变革的重大时代关卡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历史与时代背景，凝聚全球人类共同主体力量，倡导构建超越阶级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立足和平共生文明传统的新时代选择，亦是摆脱全球治理困境、超越资本逻辑霸权的新文明范式。作为历史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文化长河中早就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认同。世间万物都是由不同因素以各种不同关系构成的共同体，天下大同、和谐共生、以和为贵等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民千百年来都在追求睦邻友邦、天下共荣的大同世界。这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创新，更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平的具体体现。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人民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选择，也是超越单一民族利益、避免文明冲突的现实路径。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进步，但其实质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旧秩序基础之上的全球化形态。因此，这种不平等的全球化并不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化，而是满足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肩负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又怀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sup>[22]</sup>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关照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整体性，倡导以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中心，主张发展成果应由所有参与主体共享，从而达成世界普遍发展和共同进步的愿望。构建“一带一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实践举措，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也为各国人民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平台。这不仅是中国为实

现人类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开展的实践探索，亦是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永续发展开辟的新路径。

总的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人类整体利益、以互利共赢为价值旨归，致力于构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是超越局限性、单一性的整体性发展理念。这一理念无论在价值共识凝聚还是实践路径探索层面，都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提供了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9.
-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169.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1-52.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 [6][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7、586.
- [7]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419.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
-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7：58.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0.
- [11] 朱晓楠，戚如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话语建构的理与路[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4)：20.
- [12][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689-690.
- [14] 李桂阳.破与立：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创造性超越[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56.

- [15][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71、384.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九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31.
- [1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4.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0.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 [N]. 人民日报, 2023-09-27(6).
- [22] 陈光林, 郭凤志.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破解“两制关系”难题的新方案 [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4(5): 10-11.

责任编辑: 殷一榕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 三维阐释

吴 頔 李惠琳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实践进程中,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有哪些要求以及怎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严峻、肩负的使命任务越是艰巨繁重,党就越要以坚定的决心、有力的举措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不仅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要从抓作风入手,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保持永远在路上的自觉与定力。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要着力抓好内容的全涵盖、对象的全覆盖、责任的全链条、制度的全贯通,开创管党治党新格局。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党的建设;管党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管党治党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为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注入了鲜活内涵。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不仅将其确立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原则,更以最高党内法规的形式,宣示了党将自我革命一以贯之、持续推向深入的坚定决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

他指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sup>[2]</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厚理论土壤,又源于党的百年奋斗实践的经验升华,体现了守正创新理论品格,使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 一、科学定位全面从严治党的地位作用,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进行谋篇布

收稿日期:2025-10-10

作者简介:吴頔,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工业大学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惠琳,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工业大学新时代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专题研究与实践创新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研究”(LZ202502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局，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使其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并据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sup>[3]</sup>，“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sup>[4]</sup>。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开辟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崭新局面，为强国复兴事业提供根本保障。

####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

党的建设既是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始终扎根自身建设规律、总结实践经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提出不同的党建主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这一阶段的党建核心是锻造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确保党能在战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主要任务是巩固新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阶段的党建主题聚焦在“如何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防止脱离群众”。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面临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新的考验，党提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党建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置身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党内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因而党建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这一阶段的鲜明主题，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sup>[5]</sup>。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

我们党对管党治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确保党在复杂严峻的执政环境中永葆生机活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政治品格，也是其始终保持先进与纯洁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sup>[6]</sup>。全面从严治党，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转化为具体行动的伟大实践。首先，全面从严治党将“全面”的要求贯穿始终，确保自我革命的全覆盖、无死角。从覆盖范围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等各个层面；从实践维度来看，其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全部过程，将严的标准融入教育、监督、执纪、问责各环节；从适用对象来看，其涵盖所有党组织和党员。从而避免了自我革命流于表面或局限于局部的问题，最终实现对党的肌体的彻底净化。其次，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这一标准要求，赋予自我革命应有的强度和深度。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严字当头”，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无论是通过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来开展作风整顿工作，还是以零容忍的坚定态度铁腕反腐，都彰显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坚定与彻底。这种动真格的“从严”态势，正是自我革命精神最直接、最生动地体现。最后，全面从严治党以“治”为路径，构建了自我革命的长效机制。全面从严治党将“治”的要求系统化、制度化，通过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通过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构建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通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长效机制，为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和长效的实践路径。

###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保证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方能国强。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民族复兴伟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举措，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政治保证、组织支撑和力量源泉。首先，全面从严治党为强国复兴事业把稳正确政治方向。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全党思想、政治、行动的高度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强国复兴事业不会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始终沿着正确航向前行。其次，全面从严治党为强国复兴事业锻造了坚强组织堡垒和骨干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决清除腐败分子，淘汰能力不强、作风不实的干部，同时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筑牢基层党组织这一贯彻党的主张、团结动员群众的坚强根基，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更具战斗力、执行力和创造力，从而有效应对复兴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最后，全面从严治党为强国复兴事业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败问题不仅是党的建设中的腐蚀剂，更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顽瘴痼疾，推动形成干事创业、求真务实的良好氛围，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实基础。

### 二、深刻揭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要义，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短板与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科学谋划、统筹推进，结合管党治党实际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主要包括“从抓作风入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等。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标志着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迈上新台阶，更为管党治党建设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引，为纵深推进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指明方向。

#### （一）从抓作风入手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的直接体现，不仅关乎人心向背，更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容不得半点松懈。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即以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锲而不舍的韧劲持续纠治“四风”，坚持抓“关键少数”以带动“绝大多数”，自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就作风建设多次面向全党发表系列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sup>[1]</sup>。从抓作风入手，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立足作风建设这一起点，通过抓好作风这个“晴雨表”，带动管党治党各领域工作同步推进、落地见效。一方面，抓作风为管党治党打开了局面。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着力点，让严的态势可知可感，而作风建设正是最直接、最直观的切入点。作风问题不仅有损党的形象，更是滋养腐败的温床，因此抓作风解决的不单是吃喝玩乐等表层问题，更深层的是切断“由风及腐”的链条，推动反腐败斗争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延伸。另一方面，抓作风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供了持续动力。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突破口，以此为抓手，能够有效带动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各项工作整体提升。可以说，作风建设是带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源头起点，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供了持续动力。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推进为作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支撑和根本保障，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系统、全面的治理为后盾，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因此，从抓作风入手，不仅为管党治党打开局面，更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 （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决定党的建设方向与效果的根本性建设，在十九大被创造性地摆在总体布局的首位，确立了其“定盘星”的核心地位，极

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sup>[8]</sup>。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政治建设当居于首位。首先，政治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灵魂所系。政党的首要属性在于其政治性，讲政治是党不容动摇的鲜明底色，是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指针。党的政治建设是管总根本的“总开关”，直接关系党的建设的方向与质量，如果党的政治建设有所弱化，那么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便无从保障、无从彰显。其次，政治建设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其他方面具有统领作用。政治建设如同“纲”，党建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同“目”，前者通过确立政治方向、规范政治纪律、严明政治规矩、营造政治生态为后者提供政治前提和价值准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通过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才实现了管党治党从“治标”到“治本”的深刻转变。实践充分证明，唯有站在政治高度审视党内问题、统筹解决党内矛盾，才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真正实现管党治党的标本兼治。最后，政治建设是检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标尺。判断全面从严治党是否真正取得实效，首要标准就是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是否增强、“两个维护”是否坚决、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否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执行。换言之，政治建设抓好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向就不会偏，效果就不会虚；政治建设抓不好，其他方面的建设就可能失去根基，甚至产生方向性错误。因此，政治建设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可检验的标尺，抓住了政治建设，就抓住了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关键。

### （三）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党面临着“四种危险”“四大考验”的挑战，这决定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必将是一个持续攻坚克难的漫长过程，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永不停歇，始终“在路上”。2025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sup>[9]</sup>。从现实维度来看，尽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四风”问题得到有力纠治、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病原体”尚未彻底清除，隐形变异的腐败苗头、反弹回潮的作风隐患仍然客观存在，需要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方能应对管党治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从实践维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唯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从“一时严”走向“常态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形成长效机制。从历史使命来看，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之艰巨、形势之复杂、考验之严峻，均属前所未有的，唯有坚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才能锤炼出过硬的党风政风，才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党回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亦是党对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确保党始终焕发蓬勃生机、永葆先进本色的根本保障。

### 三、系统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路径，指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部署要求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系统观念，进一步作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部署，明确提出坚持内容上全覆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要求，这一部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进入系统优化的全新阶段，更加注重工作间的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与规范高效<sup>[10]</sup>，推动管党治党整体提质增效。

（一）坚持内容上全覆盖，保持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契合

内容上全覆盖，是指党的建设延伸至哪个领域、推进到哪个阶段，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必须构建到哪个领域、跟进到哪个阶段，确保将管党治党延伸至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领域、全过程。要求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内容与党建各领域同频共振，

这既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提升党建效能的必然选择。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项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政治建设是统领，决定党建的方向和效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思想建设是根基，需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组织建设是支撑，要着力夯实党的执政骨干与基层堡垒的基础；作风建设是镜像，直接反映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纪律建设是戒尺，要强化刚性约束；反腐败斗争则是利剑，必须保持零容忍的震慑，实施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些方面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必须统筹推进。如果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忽略了某一方面的内容，可能出现“重反腐轻思想”“重作风轻政治”的失衡，难以保证全面从严治党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正风、肃纪、反腐”<sup>[11]</sup>，因此，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在内容全覆盖上下功夫，强化系统思维、坚持整体推进，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效应，为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筑牢坚实基础。

（二）坚持对象上全覆盖，做到管治全党，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

对象上全覆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刻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坚定决心和“管党治党无例外”的平等原则。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必须以最严格的标准进行自我锻造，确保每一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是坚强有力的战斗单元。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覆盖到所有对象，不留盲区、不设例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把严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首先意味着对党员群体的无差别管治。只要是党员，无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资历深浅，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存在任何可以游离于管治之外的“特殊人员”。只要是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管理，一旦触犯

底线，就必须依纪依法受到严肃惩处。其次，坚持对象上全覆盖，要求管治范围延伸至所有领域。无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基层组织，无论是传统领域的党政机关、国企高校，还是新兴领域的“两新”组织，只要有党组织、党员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就必须落实到位，确保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何处，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就跟进到何处，彻底消除“空白地带”。最后，坚持对象上全覆盖，要求管治实践的全程覆盖。当每一位党员都受到约束、每一个领域都能被覆盖，管党治党才能真正形成“一盘棋”的格局，为党的长期执政筑牢坚实的组织基础与纪律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秉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定立场，以“打虎”惩治“关键少数”，以“拍蝇”整治基层腐败，以“猎狐”追捕外逃人员，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不仅清除了重大政治隐患，更以铁的事实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一个都不能少”的刚性原则，不负人民群众的期待与信任。

（三）坚持责任上全链条，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贯通协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sup>[12]</sup>。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关键在于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与纪委监委监督责任的贯通协同、一体落实。二者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构成管党治党责任体系的核心支柱。唯有推动“两个责任”融通联动，让管党治党的“主角”和“监督者”同向发力，方能构建起权责清晰、衔接顺畅、问责有力的责任闭环，为党的建设筑牢坚实保障。一方面，必须压紧压实党委（党组）和基层党组织的主体责任，筑牢管党治党的前沿阵地。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主动管、党委书记带头管。推动责任链条从各级党委（党组）延伸至基层党支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此外，党委书记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在工作中突出作为“关键

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党建责任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必须扛稳扛牢各级纪委监委的监督责任，强化执纪问责的专责力量。纪委监委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其监督责任是推动主体责任落实的重要保障。各级纪委监委必须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行监督职责。同时以更高标准强化自我监督，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以“内外兼修”的监督格局树起严格自律的标杆。实现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贯通协同，形成有机互动、同题共答的责任共同体，真正把管党治党的压力传导到每一个环节、每一名党员干部。

（四）坚持制度上全贯通，让制度建设贯穿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

制度上全贯通，是新时代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核心要义，其本质是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原则，通过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建设在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的全面覆盖和有机衔接，最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首先，以党章为根本，确保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制度全贯通首要前提是要紧扣党章要求，将党章的各项规定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形成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法规制度体系，确保管党治党的各项制度都与党章精神一脉相承、同向同行。其次，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夯实制度体系的组织基础。制度上的全贯通需以民主集中制为纽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将其贯穿于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再次，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的系统集成与协同高效。推动制度全面贯通，有赖于构建起科学严密、完备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各项制度之间衔接有序、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最后，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确保制度生威发力。制度的权威性是其得以有效执行的生命线，必须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通过强有力的监督检查、精准有效的问

责追责，确保每一项制度都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打通制度治党的“最后一公里”，将完备的制度体系优势，切实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治理效能。

####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进入新阶段。这一重要论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背景，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理论上，其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了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实践上，其为强化党的自身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并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逻辑日益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既为我们解码中国共产党何以能焕发强大生机活力提供了关键密钥，也为党在新征程上成功破解独有难题、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绘制了清晰的理论地图与实践航标。对其深入理解与持续践行，必将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愈发成熟定型，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更为坚实、更为深沉的领导力与保障力。

#### 参考文献：

- [1][2][3][5][8] 习近平. 论党的自我革命[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1、352、333、1、333.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4.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41.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把新时代党

- 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 [J]. 机关党建研究, 2025(7): 2.
- [9]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5-07-23(1).
- [10] 程同顺, 于慧婷. 以系统观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9): 52.
- [11] 习近平.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J]. 求是, 2023(12): 7.
- [12] 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N]. 人民日报, 2025-01-10(1).

责任编辑: 徐晓婷

#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徐克谦

**摘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凤凰涅槃、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远深厚的人文主义、民本主义思想传统,中华民族具有生生不息、追求民族永续的超越意识,中国传统哲学葆有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中国传统思想中始终有追求平等、崇尚公正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本就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中国政治文化则积累了广土众民大国治理的丰富历史经验。所有这些思想文化因素,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文化条件,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底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奋发图强、不断探索,改革开放、砥砺前行,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实践对现代化理论问题,特别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现代化”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多维度的概念,指涉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系统性变革的复杂过程。自 18 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开始,由于各种原因和历史机遇,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政治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各方面异军

突起,发展迅猛,率先获得了引领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于是西方人便把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称为“现代”的,而把世界上那些跟他们不同的社会称为“前现代的”或“传统”的。由此生发出“现代性”的概念,即把近现代西方社会的若干特征作为“现代性”的标杆,并认为西方这种现代化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概念最初都带有一定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但二者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用来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生发的深刻变革。这种过程和变革在世界各地先后不同程度地发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

收稿日期:2025-09-01

作者简介:徐克谦,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

用“现代化”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仍然是有效的。

然而，我们在运用“现代化”概念时，不可忽视其中暗含的误区和陷阱，即简单地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特征作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标准，以此来衡量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非现代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具有特殊性；而其他国家和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受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某些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性”的因素，实际在一些“传统”社会早已存在。例如，有学者指出，一些被认为是西方政治现代性的思想，早在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中即出现过<sup>[1]</sup>。而另一些西方“现代性”的元素在某些已经高度现代化的非西方社会却未必出现。因此，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虽有某些共性，但并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也并非千篇一律。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sup>[2]</sup>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功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值得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长期以来流行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念，倾向于把传统文化看成为实现现代化的消极因素，认为传统社会只有脱胎换骨，克服传统的束缚才能走向现代化。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又是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光荣历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sup>[3]</sup>，在这片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上，现代化进程其实也是古老中华文明的一次凤

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中国式现代化虽受外部推动并借鉴西方经验，但其核心源于中华文明内在驱动与中华民族发展必然要求，本质是中华文明经因革损益、适应新时代而实现的自我更新与转换。这一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虽存在需要摒弃的消极因素，但也蕴含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文化养分。关于前者，以往论者多有涉及；而后者在相当长的时期未被充分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因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条件，这些有利文化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换言之，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蕴含了一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现代性”基因。这些基因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获得成功的文化原因，也可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有利文化条件进行论述。

### 一、人文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思想传统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相伴的。强调人的价值和力量，赞扬人性的美好，肯定人的尊严，用人性来祛魅神性，这些人文主义精神正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着悠远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有学者曾指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就已经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潮，并且在17世纪、18世纪传到欧洲，给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许多启示<sup>[4]</sup>。

中国自商周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开始，“天道远，人道迩”<sup>[5]</sup>，“人能弘道，非道弘人”<sup>[6]</sup>之类的人本主义观念就开始冲击尊天事鬼的原始宗教神学的地位，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基调。孔子倡导的儒家“仁学”的核心内涵就是“仁者爱人”。从孝悌慈爱的家庭伦理推广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sup>[7]</sup>，“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sup>[8]</sup>的普遍道德准则，都表现出对人的普遍人文关怀。

《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sup>[9]</sup> 尽管在当时市场上一匹马的价格比一名奴仆更贵，但孔子在得知马厩失火之际，首先想到的是人有没有受伤。由此可见，儒家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人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sup>[10]</sup>，是“天地之心”<sup>[11]</sup>，“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sup>[12]</sup>。孟子坚信“人性善”，认为人依靠自己就可以尽心知性从而知天；荀子虽然有“人性恶”的思想，但仍然坚信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化性起伪”，从而成为“君子”乃至圣人。孔子还强调“为仁由己”，强调“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13]</sup>，《礼记·儒行》中特别提倡“特立独行”的品格，这些都表现出儒家思想对个体人格尊严和个人自由意志的尊重。同样，道家思想传统也表现出对自然人性或人的天性的尊重，体现为“贵己”“重生”的思想，提倡顺应自然符合人性的生存方式。由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自带一种天生的人文主义气息。

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这种“民本”思想虽然与现代“民主”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是可以兼容的，可以成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西方所谓“民选政府”的概念，但“民为邦本”“为民做主”“取信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政治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并且在政治实践中也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到了近现代，这一人文主义、民本主义传统不仅为政治领袖人物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政治理念提供了文化土壤，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理念提供了思想基础。

## 二、生生不息和民族永续的超越意识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反复论证，经过宗教改革后，西方形成的新教伦理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文化驱动力，即每个新教徒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现实世界获得成

功，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宠民”。因此，许多商人与资本家在激烈竞争中拼命攫取财富，而其财富积累的目的往往并非单纯为了个人挥霍享乐和满足私欲，实际上他们当中很多人生活很节俭，甚至过着禁欲主义的生活，有的还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他们往往把积累起来的财富作为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追求更大的成功，以此不断验证自己在上帝那里的“恩宠状态”。这在客观上强化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或“天职”的观念，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以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韦伯认为，这种文化动力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sup>[14]</sup>。

在此暂且不讨论韦伯这种文化解读是否牵强，或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下面仅就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文化驱动力，略陈管见。前文已经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来说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关注现世生活远甚于关注来世或彼岸世界。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类似的追求永恒与超越的精神，足以激励中国人为了实现某种长远的目标，宁可放弃眼前乃至此生的享乐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家族延续意识，秉持生生不息的传承理念。在中国传统价值认知中，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在于成就一番事业而能入谱立传，以维系家族香火绵延，庇佑子孙福祿绵长。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作为人生价值观，后世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往往以此为人生目标，不求一时富贵享乐，但求青史留名、耀祖光宗、流芳百世。普通民众勤劳致富后，往往也会省吃俭用，尽量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财富。例如，近现代一些成功的民族企业家往往把赚来的钱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己挥霍享受，并且也很愿意把资金用来接济家族中的穷人，或兴办教育，为未来投资。海外华人通常擅长企业经营，在不少地区甚至能够主导当地经济。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通常不会像多数当地人那样，赚钱后就迫不及待地

用于个人享乐消费，而是更愿意作长远打算，为子孙后代着想。

这种文化品质甚至可以扩大并上升为超越个体生存、追求民族永续发展的集体意识。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复兴、子孙后代福祉，甘愿牺牲当下的幸福，坚韧不拔、埋头苦干，前赴后继、久久为功。能够如此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心有实现民族永续生存发展、走向复兴的伟大梦想。这种文化意识是家族延续、耀祖光宗意识的扩大与升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它使得中国人能超越眼前暂时的利益，为未来作长远的规划，并凝聚成不屈不挠、奋发有为、乐观进取的民族精神。

毋庸讳言，实现现代化离不开资本积累。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进程，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殖民扩张。中国既不可能像欧洲各国在现代化初期那样，靠海外扩张到处掠夺资源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可能像某些殖民地那样，以牺牲主权和文化本位为代价换取西方殖民者的投资。中国只能靠勤劳吃苦、省吃俭用，逐步积攒资本。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在这艰难过程中，追求生生不息、民族永续的超越意识，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实事求是和知行合一的理性精神

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是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也是构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思想基础。理性思维更是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或缺的文化素质。若社会中多数人充斥着对神祇的盲从与迷信，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便会遭遇显著阻碍，甚至可能滋生普遍反智倾向，进而对现代化进程构成强劲阻力。

幸而早在先秦诸子时代，理性主义就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诸子百家讨论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事务，大多持理性实用的态度，很少借助上帝或神灵来支撑自己的主张或论点。即便名义上仍然坚持“天志”“明鬼”的墨家学

派，在判断言论主张的合理性或正当性时，所依据的准则仍然是富于实践理性精神的“三表法”，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sup>[15]</sup>，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历史的依据、经验的依据和实践效果的检验，这三者都是理性的，均不包含上帝或鬼神因素。“上帝”一词在商周时期的经典文献如《尚书》《诗经》中出现频率很高，而到了孔子的《论语》中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孔子以后的诸子百家著作中，除了在引用早期文献时偶尔提及外，“上帝”一词已基本消失。思想家们普遍用“道”和“理”之类的理性范畴取代了作为人格神的“上帝”的地位。甚至连“鬼”“神”的概念，也被理性化地解读为阴阳之气的“归”与“伸”<sup>[16]</sup>。尽管在中国古代，有鬼还是无鬼、神灭还是神不灭的争论一直存在，毕竟仍属可公开讨论的议题。王充、范缜那样的坚持无鬼论、无神论的思想家，虽然有时被视为“异端”，却没有如欧洲中世纪那些否定上帝存在或否定《圣经》中世界秩序的思想家那样，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甚至失去生命。普通民众中虽有不少人信奉各种宗教，但他们日常生活由世俗的“道理”和各种实用知识主导，甚至连其宗教活动本身也带有功利目的和实用色彩。

相较之下，中国古代的理性精神更具实践和实用的色彩，注重实际、实事、实践和实测，贯穿“实事求是”和“知行合一”的传统。西方传统哲学思维中基于纯粹理性的真理与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未成为尖锐的问题，中国文化精神总体上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汉语中“理”字的语源本于治玉之事，即循玉石之纹理雕琢而成器。“理”字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既是指客观存在于事物中的纹理物理，也是指人们根据客观之理来从事实践的活动。中国哲学强调实事求是，善于从客观事实中探求道理<sup>[17]</sup>，注重实际效果和实用价值。只有在经验和实践中，人们才能加深对

“理”的认知和理解，而对“理”的认知和把握又能更好地指导实践。这种理性主义特质，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接纳现代科学技术时，文化心理层面的阻滞较少。只要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有效的和有用的科学技术，中国人皆乐于接纳、为我所用。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清楚表明，在涉及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和态度问题上，中国受访者对科学技术的乐观肯定态度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在被问及当科学和宗教发生冲突时到底相信哪一个的问题时，中国受访者选择宁可相信科学的比率，也明显高于大多数欧美国家受访者。

#### 四、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植根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曾有学者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等进行对比，剖析农耕文明的局限及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克服的弊端。然而，农耕文明的某些智慧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不应全盘否定，反而可以为更高水平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思想文化资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是“五行之秀气”，是“天地之心”，但这并非意味着赋予人类主宰自然的特权，而是强调其肩负的宇宙责任。中国古代文化观念强调人、天、地三者共生互济，“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sup>[18]</sup>，三者共同构成宇宙生命的有机整体。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19]</sup>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违逆天地自然之道。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sup>[20]</sup>，主张“与天为徒”<sup>[21]</sup>，“人与天一”<sup>[22]</sup>。《黄帝内经》中一再强调“人与天地相参”的观念<sup>[23]</sup>。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强调人类的物质生产、日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文化等一切活动都不能违背天道，不能破坏自然节律，而应当尽量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变化相适应。例如，《礼记·月令》

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sup>[24]</sup>，季夏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sup>[25]</sup>。《管子·四时》强调王者之政要“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sup>[26]</sup>，顺应自然节律。《吕氏春秋·十二纪》更将生态保护纳入国家治理，要求统治者“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sup>[27]</sup>。传统道家思想历来反对过度人为，主张顺应自然，对仅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而追求效率的机械主义保持高度警惕，认为“无变天之道”<sup>[28]</sup>，提防过度人为对自然和天机造成的伤害。因此，中国古代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往往主张取之有度、用之以时，追求可持续发展。正如孟子所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sup>[29]</sup>在工程设计和工艺制作方面，提倡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不毁坏自然生态，师法造化，雕琢复朴，巧夺天工而又天衣无缝，力求达到人为与天成相得益彰的境界。

上述文化观念实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以及追求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些文化观念在今天看来并未过时；相反，对照西方现代化进程尤其在其早期出现的种种弊端，更能显现这些文化观念的前瞻性和现代价值。西方早期现代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机械自然观，导致自然资源被过度掠夺，引发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毁坏；同时，资本主义无限增殖逻辑与消费主义价值观，又加剧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终使环境承载力崩溃。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不能也不应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汲取农耕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智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可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支撑。

我们可将中国古代朴素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升华为现代生态存在论，将“天时地利人和”的古

老箴言转化为现代法治原则，避免一味攫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弊端，走绿色发展之路，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人类破解“生态-发展”二元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 五、追求平等和崇尚公正的社会价值观

是否平等公正地对待所有人，是现代与传统社会的重要区别。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着不平等现象，现代社会虽然也难以避免，但相对于传统社会已大为减少。因此，追求平等与公正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不平等类型各异，有的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如男女性别的不平等。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古代社会都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甚至连母系社会也不例外。还有一些不平等则是某些社会特有的，如依据血缘划分种姓、根据出生区分贵族与平民、根据肤色差异划分种族等。不平等还可分为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由于社会竞争、劳动分工、财富分配导致的地位、身份、声誉、财富差异，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普遍存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对平等和公正的不懈追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就逐渐打破了基于家族血缘的贵族与平民的身份壁垒，本来用以区别贵族与庶人的“君子”“小人”，演变为评判人们内在道德品质高低的概念，即使是乡鄙草野之民，只要品行高尚都可以成为“君子”。寒门士人凭自身才华能力成为各国卿相者比比皆是。后世科举制度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各阶层的人不论贵贱都可凭借努力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步入仕途。同时，这种制度促进文化教育在整个社会的普及，有助于推进社会的整体公平。相较于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中国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显然更具公平性和现代性。

基于种姓、种族、血缘、家族的不平等，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宗教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都曾普遍存在，有些至今仍有广泛影响。而在中国，这种意识形态从春秋战国时期就被逐渐消解了。

孟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sup>[30]</sup>；“尧舜与人同耳”<sup>[31]</sup>；“人皆可以为尧舜”<sup>[32]</sup>。意思是“天子”与普通人在人性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血缘和种族的区别。虽然历代统治者都会用天命神授、奉天承运之类的神话来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但在民间却不乏皇帝轮流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平等想法。虽然古代也有所谓夷夏之别，但那主要是基于文化差异而非种族歧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sup>[33]</sup>上古“书”类政治文献中即以“公”“平”“中”“正”“中正”“正直”“无偏无党”等词语表达了社会平等、公正等政治价值观。孔子很早就注意到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事实不平等的问题，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照顾是现代社会的平等公正的重要表现，而在中国古代，儒家就提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sup>[34]</sup>，“老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sup>[35]</sup>的社会保障思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在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sup>[36]</sup>以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主张中，实际已包含这种价值观。以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都可为当代中国构建平等、公正的现代化社会提供有利文化条件。

### 六、社会文化中普遍的世俗化倾向

以韦伯、涂尔干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理论认为，工业化、理性化与科学进步将削弱宗教的社会功能，使宗教从公共领域逐渐退入私人领域，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世俗化。因此，经典现代化理论通常将世俗化列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掌控大量土地财富资源，并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规范等有着绝对的权威。而在现代化社会，宗教影响力逐渐减弱，法律、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理性的原则、社会的共同

利益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非宗教戒律。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主要遵循世俗的法律和道德，而非宗教仪轨和教义。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世俗化的观念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而现代化又推动了世俗化的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从总体上看，天然就是世俗的。虽然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各种本土或外来宗教，但没有任何一种能凌驾于世俗政治权力之上。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教权完全掌控政治权力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情况。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本身就非常世俗化。尽管有人指出儒家学说和礼乐文化中带有宗教维度，近现代还有人试图把儒学转变为“儒教”，但这都改变不了儒学的世俗化本质。儒家以维护世俗社会秩序为己任，将精力放在现实事务的处理上，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追求现世的福禄康宁，实现世俗社会的长治久安。道家虽然有隐逸的倾向，但更多表现为精神上的高蹈和人格上的独立，并非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甚至还提倡“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与市井生活乃至仕途经济并行不悖。即使是道教，也强调“重生”的价值观，以追求长生不老为目标。而外来的佛教进入中国以后，逐渐向中国本土注重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的世俗价值观作出妥协。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也都是为培养选拔能够为国家和社会所用的人才服务，以儒家思想和经世致用的学问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从未出现如欧洲中世纪那样由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中国古代读书人普遍以“学而优则仕”为人生目标，金榜题名、功成名就、耀祖光宗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普通民众则以安居乐业、家族兴旺、发财致富等世俗价值为人生目标。中国人普遍追求现实世界的美好生活，不拒绝各种物质享受，绝大多数民众的行为很少受到宗教清规戒律的束缚。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以表现世俗生活为主，不像欧洲中世纪文学艺术那样充斥着宗教题材，也不像欧洲文艺复兴初期艺术作品那样，假借宗教题材

曲折隐晦地表现世俗的欲望。

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宗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是较低的。当被问到“宗教在您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这个问题时，中国受访者中有 42.8% 的人认为完全不重要，43.4% 的人认为不很重要，这个比例远高于各国受访者的平均数，也高于大部分西方国家受访者。当被问及“您是否认为自己是宗教信仰的人”，仅有 15.5%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个比率仅高于日本的 14.3%，而远低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

“世界价值观调查”基于多年来对全球民众文化价值观的持续调查积累数据绘制而成的文化版图显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区的世俗化程度始终高居榜首，高于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社会文化中这种重视现世、务实理性的世俗化传统，有助于推动劳动力流动、消费增长和教育普及等现代化发展。吴忠民在《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也对中国世俗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世俗化传统为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文化因素<sup>[37]</sup>。

### 七、广土众民条件下的国家治理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在超大规模人口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因此，实现广土众民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保持社会稳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现代民族国家产生前，世界的政权实体主要有部落联盟、城邦国家、封建帝国、殖民帝国等几种形式。现在人们习惯将辛亥革命之前两千多年的中国王朝都定性为封建帝国。但严格地来讲，这种归类并不准确。封建帝国的基本特征是分封诸侯、地方割据，中央权力较弱。如欧洲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其由众多的公国、侯国等组成，皇帝的权力相对有限。各诸侯在领地内有很大的

自治权，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庭等。帝国的政治结构较为松散，是一种名义上的统一。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开始，就实现了实质性的中央集权统治。秦王朝实际已废除了封建制，不分封诸侯，而是由皇帝直接派遣官吏并依据国家统一的法律治理国家，并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和文字。虽然在秦朝灭亡之后，从汉代到清末，封王授爵的封建因素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国家行政的主体结构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而是中央王朝统治之下，由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产生的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治理的国家，只是对某些偏远地区藩属国仍然通过中央“册封”实行封建自治世袭传承的制度。可以说，从秦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韦伯所说的由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借助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进行统治的现代国家政治组织形式<sup>[38]</sup>。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虽然有时也会出现地方割据、挑战中央乃至国家分裂的局面，如汉代的吴楚七国之乱，三国、南北朝的分裂，唐代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以及一些王朝末期的战乱，但这些都属于非常态的异动与过渡，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总体来看，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都能在较大范围内维持几百年的政治统一和基本稳定，使社会经济获得发展。与世界持续动荡、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的地区相比，中国能在广土众民中长久维系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实属罕见。

可以说，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古代王朝就逐步建构起带有“现代”色彩的国家行政体制，而非部落酋长联盟、封建贵族城邦之类的传统政体，也并非典型的封建帝国。钱穆曾指出：自秦汉以后，“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中国的政制发生了三个层级的演进，即“由封建而跻统一”，“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为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sup>[39]</sup>。这些演进未尝不是一种“前现代”的“现代化”进程。历代王朝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一整套在广土众民条件下治

理大国所需的制度，如中央朝廷的宰相内阁制、三省六部制、御史监察制，地方治理的郡县制、行省制，科举考试制、官员铨选制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是有制度、有法规的国家，而非王室贵族恣意妄为、军阀豪强横行霸道的地方。这些制度和王法虽未必完全达到现代社会的标准，但为现代社会准备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基础。十八世纪法国一些启蒙思想家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应该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榜样，如巴夫尔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中曾提到，“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为光华灿烂的世界”<sup>[40]</sup>。

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虽尚未完全具备现代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全面动员能力，但相比于世界其他传统社会，传统封建王朝的动员能力已相当强大。长城的修建、大运河的开凿，这些巨大工程所需的动员能力就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不挑战皇权统治的前提下，中国古代文化在经济活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多元和包容色彩。儒家文化重视家庭伦理，社会基层往往由家族和地方士绅实行社会管理。边远民族地区，则由朝廷授权当地土司自治。经济和商业活动具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先秦思想家即已提出“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sup>[41]</sup>，“关市讥而不征”<sup>[42]</sup>等促进商品流通、开放市场、减免关税的经济主张。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形成多元包容的格局，各类宗教与民间祭祀活动，只要不危及皇权统治、不煽动叛乱，无论是本土还是外来的，皆可合法存续。不同信仰体系秉持“道并行而不悖”的相处之道，相互兼容、和谐共生。各地风俗习惯颇有差异，朝廷并不作统一规定。文学艺术创作的条条框框和禁忌较少，尽可自由发挥。内地与边疆地区民族的艺术和风俗也相互交流融合。相对于单一宗教统治下生活各方面都受到宗教教义严格限制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

更易于拥抱现代文明。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蕴含着“现代”色彩的因素,为中国式现代化准备了有利文化条件。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与欧洲中世纪等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更多与现代社会兼容,甚至有利于促进现代化的文化因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形势下,继续深入认识、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优秀文化资源,将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不仅有助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

#### 参考文献:

- [1] 白彤东. 探寻理想政体: 儒家的差等秩序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24-29.
-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17): 5.
- [3]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21.
- [4][40] 朱谦之. 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155-325、251.
- [5]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581-1582.
- [6][7][8][9]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68、123、65、105.
- [10][11][24][25][35]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803-804、814、544、598、769.
- [12] 梁启雄. 荀子简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9.
- [13][29][30][31][32][41][42]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41、5、198、203、276、146、36.
- [14]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1152.
- [15] 孙诒让. 墨子间诂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66.
- [16] 黄晖. 论衡校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871-873.
- [17] 徐克谦. 中国哲学之“是”与“实、事、史、时、势”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29-32.
- [18]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68.
- [19]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63.
- [20][21][22][28] 郭庆藩. 庄子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79、134、690、433.
- [23] 张志聪. 黄帝内经集注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278.
- [26] 黎翔凤. 管子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847.
- [27]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2.
- [33] 章太炎全集(四)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253.
- [34] 诸祖耿. 战国策集注汇考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621.
- [36]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8.
- [37] 吴忠民. 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71.
- [38] 韦伯. 经济与社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719-757.
- [39] 钱穆. 国史大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4-15.

责任编辑: 殷一榕

## “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意涵、 理论特征及其思想意义

赵立

**摘要:**在历史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基于现代化建设延续中华文明传承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作为普遍原理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情势的中国实际的认识,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跃升之路。身处“两个大局”历史方位,“第二个结合”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发掘与充分运用,充分凸显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践行人民立场的实践特征,大历史观视野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主体特征,“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有机融合的文化特征,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创新特征。“第二个结合”从三个维度实现了新的思想解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有机统一;为坚定走中国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文化自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提供了丰沛的文化源泉。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特征;思想解放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契合性就被科学地揭示出来。从历史维度看,“第二个结合”将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考纳入整体中国历史的宏观视野之中;从社会维度看,“第二个结合”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考量推进到中华文明的整体社会图景之中;从发展维度

看,“第二个结合”将强调“断裂”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模式”改写为赓续与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充分把握“第二个结合”这一时代课题,需深挖其所蕴含的文化意涵,从文化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整体脉络,厘清“第二个结合”的实践特征、主体特征、文化特征与创新特征,进而充分阐明其思想解放意义。

### 一、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中国认识

在人类文明的萌生阶段,文化已经发挥了至

收稿日期:2025-10-09

作者简介:赵立,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助理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最新进展及反思研究”(23CZX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重要的作用。纵观中西方文明史，文明中心形成的显著标志就是孕育出种类繁多的文化样式，包括壁画、雕塑、语言、文字等。正是借助这些文化样式，人类文明的深度不断延伸，真正进入自觉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文明的不断演进，东西方社会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多样的社会形态，但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传统。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间，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都诞生了影响各自文明发展的思想家，“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sup>[1]</sup>。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家的观念形塑了各自文明的文化传统并延续至今。这说明，世界的不同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内在动力，而这些文明的升华也都离不开本土思想家的文化贡献。由此可见，理解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民族演化的核心密码就是文化。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双元革命”强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率先进入了发展新阶段。在霍布斯鲍姆的历史学视野中，“双元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18 世纪后期的西方思想精英从宗教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坚定选择了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这种对于欧洲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革新，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经济腾飞打下坚实基础，更凸显了文化对社会变迁与文明跃升的关键作用。

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发展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坚决批判和有力斗争。身处“双元革命”中心地带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资本主义已成为席卷全球的强大主导力量。这个由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塑造的文明样态，对全球文化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不断拓展世界历史图景，为不同地区、国家、民族间的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互鉴机会，催生

了新的文明成果，“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2]</sup>。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扩展绝非“温情脉脉”，而是“血与火”之歌，对非西方的前工业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以印度为例，英国的殖民活动“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sup>[3]</sup>。面对资本主义开启的这种全新文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其绝非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形式使其依然处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建立于其上的社会意识形式（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也需要相应的变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变革离不开不同民族孕育出的独特文化，这些文化是每个民族特性与智慧的集中体现，对民族精神和身份认同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例如，恩格斯就曾指出，德国的民间诗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说；每个时代都可以采用它们而不改变其实质”<sup>[4]</sup>。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统一性文明的批判和对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肯定，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宝贵理论财富。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苦苦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于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既达成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又维系中华文明的传承。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大潮中，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显然困难重重，既需要对传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改造，还要实现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事实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科玄论战”，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主要议题始终是：中国人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究竟应作何选择？随着中国革命实践进程的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加

深，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人和创新者，在百余年的奋斗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认识。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淬炼中愈发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进而实现建立新中国、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分析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定是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唯其如此，才会“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要科学对待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封建糟粕的一面，“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经过科学批判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服务于占全民族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化、革命的文化<sup>[5]</sup>。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化阶段。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向。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建设的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坚决“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sup>[6]</sup>。基于此，他提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江泽民立足时代发展，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结，明确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sup>[7]</sup>。胡锦涛要求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将其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起来，有力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党治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

面发挥独特的思想价值。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升华阶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充分肯定了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正是在这一深化拓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既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日益“枝繁叶茂”，而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不断为现代中国“培根育魂”。

## 二、普遍与特殊辩证关系视角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传统中国以全新姿态重新汇入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潮流。这一波澜壮阔的实践进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成功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化认识，尤其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发掘与充分运用。

孕育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现代转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给予了深度研判，指明了前进方向。因此，对于寻求救国救亡之策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破题之法。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致桑巴特的信中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8]</sup>。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因为进入中国，就能自动使现代转型难题迎刃而解。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经验中日益意识到，并不能照搬照抄、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习、掌握、运用

马克思主义始终为了解决具体的中国问题，并不意味着因其是科学理论就理所应当能在中国“落地开花”。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证明，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中国环境、解答中国问题、扎根中国大地。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遭受列强压迫的东方古国，通过何种道路才能够挽救这个亟待转型的古老文明，也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通过“开眼看世界”引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乎革命成败的核心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原则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中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国实践。

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作为具体存在的中国无疑是特殊对象，具有特殊逻辑。只有将普遍原理真正深入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将两者结合起来，方能解答中国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必然要求。同样，在具体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具体的特殊理论，被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愈发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进而演化成为具体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正是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要求。唯其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中国内涵’，而且具有‘中国形态’”<sup>[9]</sup>。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既不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也不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特殊经验，而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9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10]</sup>。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既要克服教条主义，也要超越实用主义。更重要的是，在“第一个结合”

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更加需要也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回答新时代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科学解答这一时代课题，就必须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全面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必然也必须出场了。从发生学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在场必然引发对“第二个结合”的思考。实际上，早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时，毛泽东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sup>[11]</sup>。可以说，在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不应割断历史”的语境中，已经包含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要素。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第一个结合”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与理论经验的系统总结升华，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走上快车道，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在众多领域取得标志性突破，中华民族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伟大飞跃后，又历史性迈向强起来的新征程，这自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加之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出现新情况、面临新问题，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一系列变局充分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坦途，必将不断遭遇新挑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因势而动、因时而变，持续谋划应对之策。文化事关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若缺乏强大文化支撑，民族便失去凝心聚力的核心纽带，难以在日益激烈的现代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 三、“第二个结合”理论特征的四维审视

以“第二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化，应对了“两个大局”历史方位提出的重大挑战，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

与旺盛活力。那么，如何把握“第二个结合”？这就需要基于对“第二个结合”的全面把握，厘清其理论特征，即实践特征、主体特征、文化特征与创新特征。

第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践行人民立场的实践特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我们愈发清楚地看到，没有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12]</sup>因此，我们亟须找到切实可行路径，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精粹，凝聚奋进力量，确保当代中国的复兴之路行稳致远。“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恰逢其时，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创造力，同时明确了建设具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持久引领力号召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第二个结合”的根本前提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两者相结合的成效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sup>[13]</sup>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度扎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始终锚定人民立场与实践取向，在人民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中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创造与创新提供强大动力与广阔空间。具体来说，要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愿有效统一，汇聚成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巨大合力，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而言之，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始终心系

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才能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群众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协调发展。

第二，大历史观视野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主体特征。大历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的具体形态，也是我们准确理解“第二个结合”理论特征的重要途径。唯物史观业已揭示，现代化肇始于西欧社会，但不意味着现代化只有西欧范式，东方文明的内在发展潜能使其同样可以形成既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又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途径。大历史观为我们从世界尺度来理解人类文明提供了新的视野，即不同于以资本为基础的西方单一文明中心论，而是“以天下观天下”的多元文明共存论。由此，每一种文明自身的特质与价值都获得了存在论上的证明，成为具有主体性的文明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华，构成与拓展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与发展空间，为中国道路注入了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的文化自信。顾名思义，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第二个结合”充分激活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延续下来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并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进而演化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文化力量、铸牢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彰显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征。

第三，“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有机融合的文化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sup>[14]</sup>魂脉与根脉的比喻形象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旨，即在风云激荡的新时代征程中走好中国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魂与根。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重探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宝库,从中挖掘能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优秀文化因子,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智慧精华与扎根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并将两者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汇通起来,在悠远历史与奋进当代、深刻理论与日常观念的交汇中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优势。这离不开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深刻理解与把握,离不开对“第二个结合”前提与结果的深刻思考与阐发,离不开对文化主体性的深刻认识与巩固,离不开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深刻总结与回答。唯有基于“第二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的有机融合,中国道路方能彰显其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党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第四,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创新特征。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阔步向前。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只会在交流中多彩、在互鉴中丰富,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百花园。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决不会自我封闭,而是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第二个结合”所强调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交流互鉴的根基,是我们必须继承并创新的精神财富。这要求我们秉持科学态度,既不能搞文化虚无主义的厚今薄古,也不能搞文化复古主义的厚古薄今,而应在鉴别的基础上有取有舍,在扬弃的基础上传承创新。“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基于时代特点对其“内涵和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激活中

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顺应时代发展,“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通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得以在当代创新的推动下,适应当代中国、协调现代社会、融通现实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场域中,跨越古今东西的时间与空间,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正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使命,书写中国文化建设新篇章的内在要求与具体方法。

#### 四、“第二个结合”推进思想解放的三维考察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积极引领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忠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走上新高度、思想解放达到新水平、文化自信注入新力量。“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中孕育发展,最终呈现为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系统阐述,在当代中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塑造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而“以思想解放的内涵为起点追问‘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有助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sup>[15]</sup>。

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间节点上,毅然扬弃了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为19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思想火花,并在世界历史持续走向现代化深处的背景下,愈发照亮了人类社会前行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16]</sup>。“两个彻底决裂”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解放的坚定追求,并将其内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品质,使其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始终

彰显思想解放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思想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典型代表。进入新时代,“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sup>[17]</sup>。这一重要论断指明,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出场目的就是,通过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汇聚中华文化的精髓,从而以新的思想解放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此,我们必须充分把握“第二个结合”是如何推进新的思想解放的。

第一,在理论层面,“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根脉”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全体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以高度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可以说,没有“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地位就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对中华文明与文化地位的认识难以取得长足进步。必须看到,在传统思想语境中,人们对于中国文化是高度肯定、高度自信的。只是到了现代化转型时期,随着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政治变革的失败,才演变为对中国文化发展程度的质疑,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不断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落后不能简单归因于传统文化,不能将其视为“替罪羊”而一概否定。事实上,恰恰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征,塑造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韧性与发展潜能,进而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sup>[18]</sup>。因此,没有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内在支撑,就没有在现代化浪潮中昂首屹立、阔步前行的现代中国。只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华文明,而要明确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中华文明开辟出中国现代化道路,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因此,必须完整、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准确意涵,既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地位,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原则,在两者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基础上实现有机统一。

第二,在思想层面,“第二个结合”夯实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为走中国道路提供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sup>[19]</sup>这表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决定了现代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辛、付出巨大代价开辟出来的,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这条道路并非任何模式的复制品,翻遍教科书也找不到现成答案。那么该如何走好自己的路?答案只能从“中国特色”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不一样,之所以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sup>[20]</sup>“第二个结合”通过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批判复古主义、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深度扭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充分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对濡养中国道路、夯实文化根基的重要作用,极大增强了坚定走好中国道路的底气与信心。

第三,在实践层面,“第二个结合”为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为坚持和发展理论与制度提供了丰沛的文化源泉。“‘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并且“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sup>[21]</sup>。这表明,以“第二个结合”推进的思想解放,最

终要落脚到对“两个大局”所引发的现实问题的回答上来，即扎实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层出不穷的风险与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挖掘好、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库中的瑰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提供文化根基和思想滋养，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夯实道路根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内容的理论和制度，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淬炼，其创新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方位上，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奋进力量的需要愈发迫切，对通过“第二个结合”为当代中国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复调式动力与多层次资源的需要愈发迫切。因此，必须充分把握“第二个结合”与思想解放的内在关系，以“第二个结合”的创新机制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文化主动，以此推进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激活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sup>[22]</sup>，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的时代性建构”基础上<sup>[23]</sup>，巩固好文化主体性。这也正是我们必须担负好的新时代文化使命。

#### 参考文献：

- [1] 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M]. 魏楚雄, 俞新天,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8.
- [2][3][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686、5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8.
- [5]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6-708.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编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26.
- [7] 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24.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64.
- [9] 杨耕. 再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结构 [J]. 哲学研究, 2023(10): 26.
- [10][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五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51、651.
- [12]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5.
- [13] 方兰欣. 关于“第二个结合”的三个基本问题 [J]. 学术界, 2024(6): 49.
- [14]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是, 2023(20): 5.
- [15] 杨洪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4): 10.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8.
- [18] 习近平.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J]. 求是, 2024(23): 6.
- [19][2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8.
- [20]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4: 30.
- [22] 赵立. 文化自信视域下“第二个结合”的再审视 [J]. 文化与传播, 2025(4): 8.
- [23] 张艳娥. 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的时代性建构——“第二个结合”的原理性贡献及思想解放意义 [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5(3): 13.

责任编辑: 王天海